

分类号 _____
UDC _____

密级 _____
编号 _____

兰州财经大学

LAN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硕士学位论文

(专业学位)

论文题目 子女结构对商业养老保险参与的影响研究

研究生姓名: 李珊

指导教师姓名、职称: 高树棠、教授

学科、专业名称: 应用经济学、保险硕士

研究方向: 保险经营与管理

提交日期: 2024年5月26日

独创性声明

本人声明所提交的论文是我个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尽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了谢意。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李珊 签字日期： 2024.6.2

导师签名： 文树亭 签字日期： 2024.6.2

导师(校外)签名： _____ 签字日期： _____

关于论文使用授权的说明

本人完全了解学校关于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各项规定， 同意 (选择“同
1.学校有权保留本论文的复印件和磁盘，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

2.学校有权将本人的学位论文提交至清华大学“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用于出版和编入CNKI《中国知识资源总库》或其他同类数据库，传播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李珊 签字日期： 2024.6.2

导师签名： 文树亭 签字日期： 2024.6.2

导师(校外)签名： _____ 签字日期： _____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child structure
on the participation of commercial
endowment insurance**

Candidate : Li Shan

Supervisor: Professor Gao Shutang

摘 要

随着我国生育政策由上世纪的独生子女政策逐步过渡到允许单独夫妇生育二孩、全面实施二孩乃至进一步开放三孩，这不仅促使了家庭子女结构的变化，也促进了社会生育观念的深刻变革，从而造成家庭内部子女构成的多样化趋势愈发显著，子女数量和性别比例的差异日益加大。这些变化对家庭资源配置、抚养支出以及长远的养老规划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进而影响商业养老保险的参与。本文结合当下形势，探究子女结构对我国商业养老保险参与的影响，期望能以此深入地解释家庭商业养老保险参与行为的理论，丰富以子女为主要视角的实证研究，并且为保险公司产品创新、优化客户服务提供依据，促进我国养老保险市场的健康发展。

本文在研究过程中，将理论与实证相结合。首先对国内外已有成果进行梳理，结合相关理论分析子女结构对商业养老保险参与的影响机理，并分析我国子女结构和商业养老保险发展现状。在此基础上，选取 2021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作为样本数据，实证方法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以探究其相关性，并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进行稳健性检验证明其结果可靠性。将总样本按照地域和工作部门划分子样本进行异质性检验，以此来探究不同特征在子女结构影响商业养老保险参与中的作用差异。将家庭全年总收入作为中介变量，探究子女数量和子女性别与商业养老保险参与之间是否存在中介效应。研究结果发现：子女数量对商业养老保险参与有显著负向影响，拥有男性子女将抑制家庭商业养老保险参与。子女结构在东部地区家庭的作用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家庭，在非国有部门及企业工作的家庭显著高于国有部门家庭。家庭全年总收入在子女数量与商业养老保险参与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在子女性别与商业养老保险参与之间不存在中介效应。

基于此，本文建议保险公司创新保险产品、推动缴费金额弹性化、利用科技赋能，政府应实施政策差异化并加强养老保险政策的宣传和普及。

关键词：子女结构 生育政策 商业养老保险参与 倾向得分匹配

Abstract

With the gradual transition of China's fertility policy from the one-child policy of the last century to allowing single couples to have two children, the full implementation of the two-child policy and even the further opening up of the three-child policy, this has not only prompted changes in the structure of children in the family, but has also contributed to a profound change in society's concept of childbearing, which has resulted in a more and more pronounced diversification of the composition of children within the family, and an ever-growing disparity in the number of children and gender ratios. These changes have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allocation of family resources, dependency expenditures and long-term pension planning, which in turn affects the participation of commercial pension insurance. 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mpact of children's structure on China's commercial pension insurance participation, hoping to explain the theory of family commercial pension insurance participation behavior in depth, enrich the empirical research with children as the main perspective, and provide a basis for insurance company product innova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customer service, so as to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hina's pension insurance market.

This paper combines theory and empirical evidence in the research process. First of all, we sort out the existing result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analyze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children's structure on the participation of commercial pension insurance by combining the relevant theories after analyzing the children's structure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mmercial pension insurance in China. On this basis, the 2021 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 data is selected as the sample data, and the empirical method adopts ordinary least squares regression to explore the correlation, and the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method is used to conduct a robustness test to prove the reliability of the results. The total sample is divided into sub-samples according to geography and work sector for heterogeneity test, as a way to explore the differences in the role of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in the influence of children's structure on commercial pension insurance participation. The total annual income of the family is used as a mediating variable to investigate whether there is a mediating effect between the number of children and the gender of the children and commercial pension insurance participation.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number of children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 on commercial pension insurance participation, and having male children will inhibit families' commercial pension insurance participation. The role of child structure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for families in the eastern region than for families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and families working in the non-state sector and enterprises a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families in the state sector. There is a partial mediating effect of total annual household

income between the number of children and commercial pension insurance participation, and there is no mediating effect between the gender of children and commercial pension insurance participation.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insurance companies should innovate insurance products, promote the elasticity of contribution amounts, and utilize technology to empower them, and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implement policy differentiation and strengthen the publicity and popularization of pension insurance policies.

Keywords: Child structure; Fertility policy; Commercial pension insurance participation;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目 录

1 绪论	1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1
1.1.1 研究背景.....	1
1.1.2 研究意义.....	4
1.2 文献综述.....	4
1.2.1 子女结构的相关研究.....	4
1.2.2 商业养老保险参与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5
1.2.3 子女结构影响商业养老保险参与的相关研究.....	6
1.2.4 文献评述.....	8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8
1.3.1 研究内容.....	8
1.3.2 研究方法.....	9
1.4 创新与不足.....	10
1.4.1 创新点.....	10
1.4.2 不足之处.....	10
1.5 技术路线图.....	12
2 子女结构与商业养老保险参与的理论分析	13
2.1 基础理论分析.....	13
2.1.1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与商业养老保险参与.....	13
2.1.2 代际支持理论与商业养老保险参与.....	15
2.1.3 福利多元主义理论与商业养老保险参与.....	16
2.1.4 生命周期理论与商业养老保险参与.....	17
2.2 子女结构对商业养老保险参与的影响机理.....	18
2.2.1 子女数量对商业养老保险参与的影响.....	18
2.2.2 子女性别对商业养老保险参与的影响.....	20
3 子女结构与商业养老保险的现状分析	22
3.1 子女结构现状.....	22

3.1.1 子女数量现状.....	22
3.1.2 子女性别现状.....	24
3.2 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与现状.....	26
3.2.1 商业养老保险市场及政策.....	26
3.2.2 商业养老保险产品及用户.....	27
4 子女结构对商业养老保险参与影响的实证研究.....	29
4.1 数据来源.....	29
4.2 变量选取及其说明.....	29
4.2.1 被解释变量.....	30
4.2.2 解释变量.....	30
4.2.3 中介变量.....	30
4.2.4 控制变量.....	30
4.3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33
4.4 模型构建.....	34
4.4.1 OLS 回归模型.....	34
4.4.2 倾向得分匹配模型.....	34
4.4.3 中介效应模型.....	35
4.5 回归结果分析.....	36
4.5.1 基准回归分析.....	36
4.5.2 稳健性检验.....	38
4.5.3 异质性分析.....	43
4.5.4 中介效应分析.....	47
5 结论与建议.....	50
5.1 结论.....	50
5.1.1 基于全样本分析得出的结论.....	50
5.1.2 基于区域异质性分析得出的结论.....	50
5.1.3 基于工作部门异质性分析得出的结论.....	50
5.2 建议.....	51
5.2.1 创新保险产品满足多方位需求.....	51

5.2.2 推动缴费金额弹性化顺应负担差异.....	52
5.2.3 利用科技赋能提升服务效率与体验.....	52
5.2.4 实施政策差异化.....	53
参考文献	54
后 记	59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1.1.1 研究背景

1953年，我国进行第一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人口总数为6.02亿人。1955年3月，中共中央做出中国人口增长过快这个判断，并提出要适当地节制生育。1982年，计划生育政策被正式确立为国家的基本政策，其不仅有效的控制了人口的过快增长，而且大力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然而，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实行也存在双面性，使我国出生人口急速下降，老龄化程度逐渐加深，性别比例失衡现象日益严重。为了使人口结构得到改善，我国在生育政策上经历了从严格到宽松的转变。从2011年起，各个地方开始允许双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生育两个子女，接着在2013年允许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生育两个子女，直至2015年允许所有夫妇均可生育两个子女，这一系列政策的调整也标志着中国实施了长达35年的独生子女政策的结束。到了2021年，我国已经正式步入全面三孩时代，所有夫妇均可生育三个子女。

然而，尽管生育政策在不断放宽，却未能完全激发育龄夫妇的生育欲望，导致中国生育率持续呈断崖式下滑。我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年末全国人口140967万人，全年出生人口902万人，人口出生率为6.39%，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48%。如图1.1所示，从2017年至2023年，中国出生人口已经连续七年下降，2022年和2023年总人口连续两年下降。在出生率持续走低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家庭子女结构发生较大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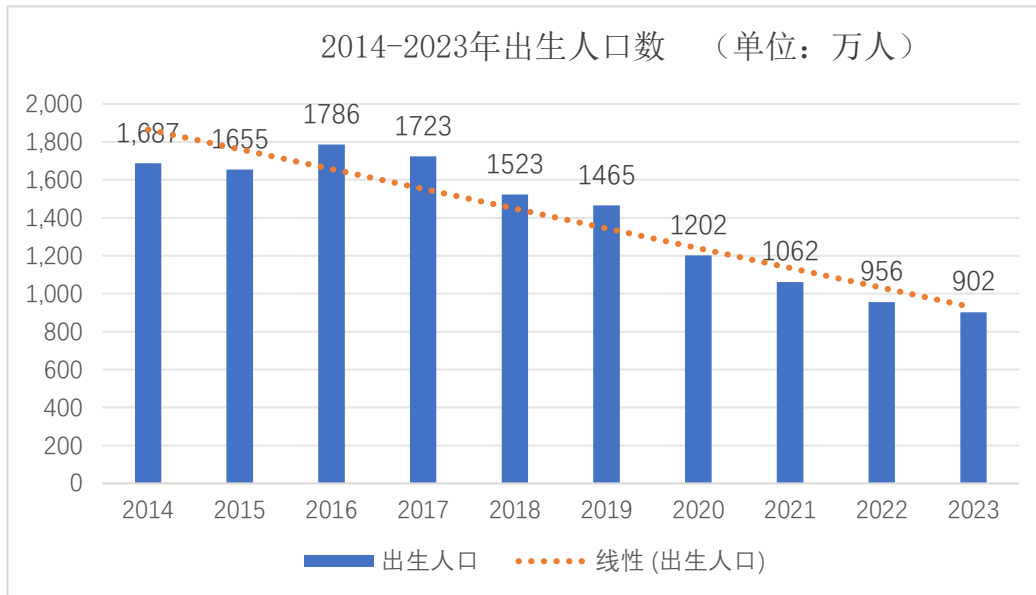


图 1.1 2014-2023 年出生人口数

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

同时,我国人口调控政策逐渐凸显出性别比例失衡问题。独生子女政策曾作为我国的重要计划生育政策,大力缓解了人口压力,但是也导致了出生性别比例的失衡,尤其对男女性别比例的影响更为明显。这种性别比例失衡进一步扩大了未婚男女比例,给我国人口结构和社会稳定性带来一系列挑战和问题。随着放开政策的出台,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截止至2023年末的人口主要数据,从性别构成看,2023年男性人口72032万人,女性人口68935万人,男性人口比女性人口多3097万,总人口性别比为104.49(以女性为100)。而2022年男性人口72206万人,女性人口68969万人,男性人口比女性人口多3237万人,总人口性别比为104.69。通过本次数据分析可知,中国性别比例在逐步改善,但其失衡状态仍然普遍存在。

人口老龄化问题也值得关注,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到2023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规模达到了29697万人,占全国人口的21.1%。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21676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5.4%。与之相比,2022年60岁及以上人口规模为28004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9.8%,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20978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4.9%。显然,2023年的老年人口数量和所占比例都比前一年有所上升,这进一步加剧了老龄化的趋势,使得养老问题逐渐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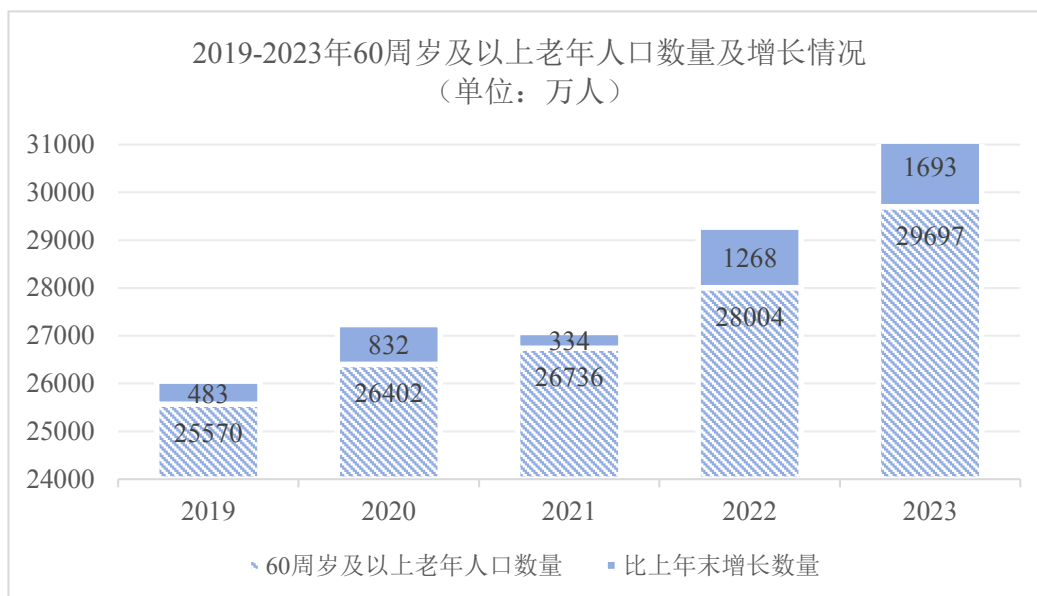


图 1.2 2019-2023 年 6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及增长情况

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

为了有效地应对人口老龄化给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的各种风险和挑战,“十四五”规划将推动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作为重要举措。推动商业养老保险发展不仅可以显著提高养老保障的供应,更好地满足老年人群的多方位养老需求,还能够把储蓄养老转化为投资养老,从而形成新的养老保障渠道,做到最大限度地保障老年人的养老话语权和保障选择权。

当前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是我国养老保障体系的首要组成部分,然而养老金账户却存在严重的收支不平衡问题。同时,企业(职工)年金作为养老保障的第二支柱,其发展始终受各方面因素阻碍,但是其改进发展潜力仍然巨大。因此,无论是第一支柱还是第二支柱,都无法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商业养老保险作为养老金体系的第三大支柱,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扩大和加强第三支柱的养老保险体系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2018年5月1日,政府启动了为期一年的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但截至2020年4月底,全国累积的保费收入仅有三亿多元,实际投保人员也仅有4.76万人,远远不及预期效果。自2022年11月起,全国个人养老金制度开始全面实施。截至2023年上半年,个人养老金账户累计开立数已突破4000万大关。尽管个人养老金开户队伍持续扩容,但缴费比例较低,平均缴费额较低。尽管该制度覆盖了高达7亿的人口,但真正参与的人数仅约为4000万。在这4000万人中,到2023年第一季度结束时,真正完成缴费的人数仅为近四分之一。许多未缴纳的账户可以看出居民的参与意愿并不强烈。此外,平均缴费额度较低,人均储存水平约2000元,远低于12000元的年额度上限。

可见，推进第三支柱养老保险的成效并不突出，它的进一步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

因此，只有充分结合我国的人口实际情况，将子女结构作为主体纳入对商业养老保险参与的影响分析中，才能更为有效地促进养老保险市场的向上发展和不断完善。以家庭为研究视角，考察个体对参与商业养老保险的影响因素，研究子女数量和性别是否对个体商业养老保险参与产生影响是十分有意义的。

1.1.2 研究意义

(1) 理论意义

现有文献中，关于人口结构对商业养老保险参与的影响，研究主要从宏观层面进行，通常使用省际面板或截面数据进行分析，这些研究主要关注老年抚养比、少儿抚养比等宏观指标。然而，很少有学者利用微观数据，从各个家庭中子女的角度进行分析。本研究旨在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深入探讨子女结构对家庭商业养老保险参与的影响，充实现有阶段理论研究的不足，为未来商业养老保险研究者提供新的视角。

(2) 现实意义

本研究旨在探讨子女数量和子女性别对商业养老保险参与的影响，并就此提出建议，希望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发展商业养老保险和完善养老保障体系。同时，针对不同家庭子女结构，本研究还为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设计、服务等方面提出一些建议和思路，以期丰富保险产品内容，满足养老保险需求。对于完善商业养老保险机制，满足民众养老需求，健全多层养老保障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2 文献综述

1.2.1 子女结构的相关研究

子女在家庭经济决策中往往占据着重要地位，因为他们不仅是家庭未来的经济支柱，也是家庭经济状况的直接受益者和影响者。家庭进行经济规划时，会将子女的需求、兴趣和发展方向作为重要考量因素。因此，诸多学者在研究中均将子女结构视为影响家庭经济决策的重要因素之一，特别是在家庭消费水平、金融资产配置、储蓄和负债等方面的决策上，子女结构的影响尤为显著。这些决策不仅关乎家庭日常生活，更对商业保险参与的长远规划产生深远影响。

国外很早就对子女数量的影响进行研究，从家庭总收入的角度，Korenman 和 Neumark (1992) 的研究表明，随着子女数量的增加，母亲需要投入更多时间照顾子女，从而降低母亲在劳动市场上的竞争力，进而导致母亲所能提供的家庭可支配收入减少。从家庭总支出的角度，Goldin 和 Katz (2008) 选择子女数量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子女的教育支出问题进行分析，其结果表明家庭处于的生命周期不同，子女的教育支出也会存在显著不同。从资产配置角度，Calvet 和 Sodini (2009) 的实证研究结论为家庭投资谨慎度会受到子女数量的正向显著影响，从而抑制家庭对风险资产的持有，使其更倾向于保守投资。Céline 和 Nick (2021) 利用美国人口调查数据，发现随着子女数量的增加，男性在劳动力市场变得更具竞争力，而女性在劳动力市场占据劣势地位。

在中国，婚姻市场的传统观念对家庭经济决策产生着深远影响。受男婚女嫁观念的影响，男方通常被期望承担房车购置和彩礼支付等大额支出。这种预期的未来大额支出会显著影响家庭当前的金融资产选择。另外，中国的家庭结构也会对子女结构和家庭经济决策产生紧密的联系。在汪伟 (2010) 的观点中，随着教育和文化水平的提升，以及传统和主流家庭价值观的影响，父母在抚养子女方面的投入越来越大，且无论代价如何也不图回报。这种观念直接影响到家庭的资产配置，也就是说，子女的数量决定了家庭在金融市场上的投资规模和分配方式。方丽和田传浩 (2016) 选择男性子女作为研究样本，明确其结论为拥有男性子女的家庭更倾向于购买房子这类不动产以增加成婚率，但这也显著增加了他们的经济负担。王翌秋和王昊宇 (2018) 深入探讨了城乡家庭在子女数量上对资产配置上的差异。研究结果显示，在家庭第一个孩子出生到所有孩子长大成人并离开父母独立生活的这一阶段，经济活动主要集中在孩子身上，城乡家庭优化家庭资产配置普遍通过增持房产和减少风险性金融资产持有。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趋势在农村家庭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一发现揭示了子女数量在家庭资产配置中的重要影响，并凸显了城乡家庭在资产配置策略上的差异性。同样在资产配置方面，根据王韧和许豪 (2022) 基于 CFPS 数据的分析，子女数量与家庭股票投资的广度和深度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进一步分析发现，有男孩的家庭倾向于降低对股票和其他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投资，而有女孩的家庭则相反。

1.2.2 商业养老保险参与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在早期阶段，国外学者已经对商业养老保险参与的影响因素展开了深入的探究，并通过长期对人寿保险市场需求的剖析，达成了多项重要的共识。

Hammond 和 Houston 等（1967）运用截面数据，探讨了经济与人口特征对寿险保费支出的影响，特别关注了教育和职业因素的影响。Lewis（1989）进一步开展了跨国对比研究，旨在揭示墨西哥与美国在寿险增长方面的差异，他发现个体的年龄、教育水平和收入状况对寿险选择具有显著影响，并且墨西哥的寿险需求相较于美国表现出更高的收入弹性。T Beck 和 J Webb（2002）将 68 个经济体在 1961 年以后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发现宏观层面的多个因素，诸如通货膨胀、人均收入等，在解释寿险在不同地域间的相似差异上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否购买寿险产品与社会保障的整体规模之间并未展现出紧密的联系。

徐晖（2008）通过灰色关联度分析，证实了寿险增长和可支配收入等因素之间的关系。彭魏倬加（2020）选用 2017 年 CGSS 的微观数据，得出的结论为新媒体可以最大程度地促进商业养老保险参与。高立飞和王国军（2021）发现人口流动会显著提高商业养老保险参与的概率。蹇滨徽和杨亮等（2021）对基础养老金展开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当前家庭商业养老保险支出偏低，适当调整基础养老金替代率有助于提高家庭商业养老保险支出，促进商业养老保险和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发展，提升整体养老金待遇水平。在谢波峰和常嘉路（2021）看来，提高个税起征点降低停掉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概率，而新增专项附加扣除则因税收优惠的替代效应导致停保概率上升。李璐桐和毛磊（2022）以行为经济学为基础，研究了助推行为对提高养老保险需求的异质性影响。实证发现，基于现状偏好的助推对具有保险购买经验或认可保险行业的群体影响较为显著。

1.2.3 子女结构影响商业养老保险参与的相关研究

尽管国内外专门探讨子女结构对商业养老保险需求影响的研究较为有限，但关于子女结构如何影响人寿保险需求的研究却颇为丰富。商业养老保险属于人寿保险，本文通过对国内外寿险相关文献的梳理，以期为本研究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Berekson 和 Leonard（1972）的开创性研究指出，家庭中首个孩子的性别可能会影响人寿保险的购买决策，尤其是当第一个孩子是男性时。随后，Ferber 和 Lee（1980）在上述两位学者理论的基础上，选择年轻夫妻作为研究对象，指出在承担子女抚养责任的同时，家庭对经济稳定性的需求增强，因此更倾向于增加保险持有量。同样的，Showers（1994）指出子女数量与家庭在商业保险上的保费支出呈现正向相关。Sara（2020）的研究则进一步拓宽了视野，除了关注子女数量外，还探讨了家庭的性别偏好。她指出，家庭对男性子女的偏好主要源于对代际经济支持的期望。对收入较低的家庭更为明显，

他们更可能依赖男性子女提供经济上的支持和保障，以确保基本生活水平的维持。这种性别偏好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家庭的保险决策。Sheng 和 Rao(2023)基于 SOR 理论，实证分析发现体制内家庭和户主为女性的家庭购买商业人身保险的意愿较低，单女户和城镇家庭对商业人身保险的需求更大。

在国内，从子女数量的角度来研究其对商业养老保险需求的影响的文献相对较多。尹秀芳(2014)的研究发现，子女数量增加会替代保险的风险转移功能，特别是对于农村家庭男性子女的数量增加这种现象更为突出。从宏观指标出发，樊纲治和王宏扬(2015)利用 CHFS2013 年数据，发现需抚养子女的增加和家庭规模的缩小则会推动寿险市场的发展。张雷和顾天竹(2020)研究发现，子女数量能够显著地影响家商业保险参与。在城市地区，子女数量的变化对父母的商业保险需求影响更加显著。卢亚娟和张雯涵(2020)采用了倾向得分匹配的方法，研究发现，家庭中老人越多，保障类商业保险越受到家庭的青睐，而青少年越多，商业保险越不被需要。尹志超(2022)使用面板数据，发现家庭未成年子女越多，家庭越倾向于购买商业保险，但男性子女的存在会使这一效应变小。王鑫鑫，朱青青(2021)通过实证分析旨在探究流动人口中养育负担是如何影响商业养老保险参与的。结果表明，子女成长阶段、子女数量、子女性别均对养老保险支付意愿和参保行为有显著影响。子女数量促进实际参保行为表现在子女稳定阶段(30 岁以上)。而处于综合阶段(17-24 岁)的子女性别可能导致参保意愿和行为不一致。

从居民面对的养老风险、养老意愿和养老担忧度进行分析，国内学者已有较深入的研究。范成杰(2013)从代际关系视角分析了农村家庭养老面临困境的原因，主要是在农村，代际关系正逐渐向下层发展，这意味着在养老方面，子代的行为变得更为理性。超越了经济伦理性行为特征，逐渐消弭于代际关系的运行中。刘一伟(2017)的研究表明，居民的养老期望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呈现出多样性。具体而言，子女养老和政府养老这两种不同的养老理念对生育意愿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影响。而养老预期在社会养老保险与生育意愿之间起关键调节作用。因此子女养老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养老保险对居民生育意愿的负面影响，而政府养老的方式则加剧了这种影响。此外，这种效应在男性和农村群体中尤为显著，揭示了不同社会背景下养老期望与生育意愿之间的复杂关联。

郝静和王炜(2017)研究发现，家庭经济状况越好、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状况越佳、以及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越充分，老年人的养老担忧度就会相应降低。此外，独生女相较于独生子而言，更偏向于不与父母同住，被认为未来只能提供较少的养老支持，从而导致独生女父母的养老担心度可能更高。衡元元(2018)通过问卷分析得出的研究结果

显示，老年人普遍更倾向于选择家庭养老这种方式。当考虑到子女数量差异时，老年人对于未来养老的担忧以及养老方式的偏好会有所不同，他们会做出不同的判断和选择。于长永（2018）通过对农村老年人的养老期望进行分析，发现家庭规模越大养老风险越小，且不具有地区异质性，无论农村老年人处于哪个地区，家庭支持始终是他们最期望的养老方式，将养老风险寄希望于社会力量的老年人较少。徐强（2023）对于长永的研究对象做了补充，重点研究农村居民群体，分析发现农村居民的养老担忧度较高，子女数量越多，年龄越大，家庭储蓄越多，农村居民养老担忧度越低。

1.2.4 文献评述

通过全面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资料可以发现，学者们在养老保险研究领域已取得了不小的进展，对我国养老保险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价值。不过，现存的研究尚存一些不足之处。在经济因素如何影响寿险需求方面，已存在大量研究文献，而从家庭角度对商业养老保险需求的深度解析则显得相对匮乏。在探讨商业养老保险需求的家庭人口结构视角文献中，研究人员最开始主要依赖宏观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主要探讨家庭老年抚养比、少儿抚养比和家庭规模等人口结构指标与商业养老保险需求之间的相互关系。然而，从子女视角出发，研究家庭子女数量和性别对养老保险需求的影响的文献却相对较少，而且在子女结构对商业养老保险参与的影响机制方面的研究也显得不够深入。

随着中国逐渐步入人口老龄化阶段，养老问题已然成为全社会共同面临的紧迫挑战。对于每个微观家庭而言，由于家庭经济负担的差异性，其对养老保险的需求和参与程度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因此，本文选择从家庭这一微观视角切入，探讨商业养老保险的参保行为，旨在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当前研究的不足，为养老保险研究提供更为新颖和深入的分析视角，为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与发展提供全新的视角。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1.3.1 研究内容

第一章为绪论。本章主要介绍当前子女结构发生转变的背景及我国养老保险的发展概况，并对本文的理论和实际意义进行了总结。对国内外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整理和评述，

明确了本文的研究方法和整体框架，并指出了本文的创新之处和存在的不足之处。

第二章为子女结构与商业养老保险参与的理论分析。本章致力于理论剖析子女结构与商业养老保险参与之间的内在联系。系统地整合了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代际经济支持理论、福利多元主义理念以及生命周期经济理论，以此框架为基础，对这些理论如何与商业养老保险的参与相互交织、影响进行了深度解读。进而，本章紧密结合研究主题，聚焦于子女数量特征以及子女性别的差异化配置，细致入微地探索这些变量如何作用于商业养老保险的参与决策过程，揭示其间隐藏的因果关联和动态影响机制。

第三章为子女结构与养老保险参与的发展现状分析。本章结合生育政策对子女结构现状进行分析，再结合商业养老保险目前存在的困境和发展趋势，对两者的现状进行全面的分析，为后续提供建议建立良好的基础。

第四章为实证研究部分。本章将 2021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进行数据的处理和变量的选择，并据此构建了基准回归模型、倾向得分匹配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本文以子女数量和子女性别为解释变量，以是否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为被解释变量，运用 OLS 模型探究两者之间的关系，为增加实证结果可信性，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将总样本按照地域和工作部门划分子样本进行异质性检验，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深入了解不同特征在子女结构影响商业养老保险参与中的作用差异。将家庭全年总收入作为中介变量，探究子女数量和子女性别与商业养老保险参与是否存在中介效应。

第五章为对策与建议。在前文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本章对具体影响方向和程度进行了全面的归纳和总结，并将这些分析结果与实际情况相结合，针对存在的各种问题，提出具有可行性的建议，旨在推动商业养老保险市场更为健康地发展。

1.3.2 研究方法

（1）文献分析法

本文通过对国内外学者在子女结构与商业养老保险需求的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做出梳理，对我国商业养老保险现状和相关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性地研究。通过这一研究，我们期望能够更全面地理解家庭在进行商业养老保险决策过程中的考量因素，为相关政策制定和市场开发提供更为精准的参考依据。

（2）实证研究法

本文将 2021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作为样本，应用 Stata17.0 数据分析软件，采

用 OLS 模型进行基准回归分析，从子女数量和子女性别两个维度出发，深入探究它们与商业养老保险参与的可能性和参与程度之间的关系，通过实证结果对数据呈现的原因进行细致的分析。为了验证结果的稳健性，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进行检验。

（3）比较研究法

为深入探究子女结构对不同群体在商业养老保险参与上的具体影响，按照区域与工作部门的差异对样本进行分组，并在不同分样本间进行对比研究。通过实证分析，详细考察不同群体之间影响的可能性和影响程度，以期探讨它们之间的一致性与差异性。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子女结构对商业养老保险需求的影响，还能为相关政策制定和市场开发提供更为精准的参考。

1.4 创新与不足

1.4.1 创新点

（1）在研究人口结构如何影响商业养老保险的各种因素时，多数文献聚焦于家庭中的老年人口比例、少儿人口比例以及家庭规模等经典指标。本文旨在突破这一传统框架，结合我国近年来的人口变化趋势，特别是子女结构的变化，来重新审视商业养老保险的影响因素。通过使用 2021 年 CGSS 的微观数据，深入剖析子女数量、性别与商业养老保险参与之间的关系，为相关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实证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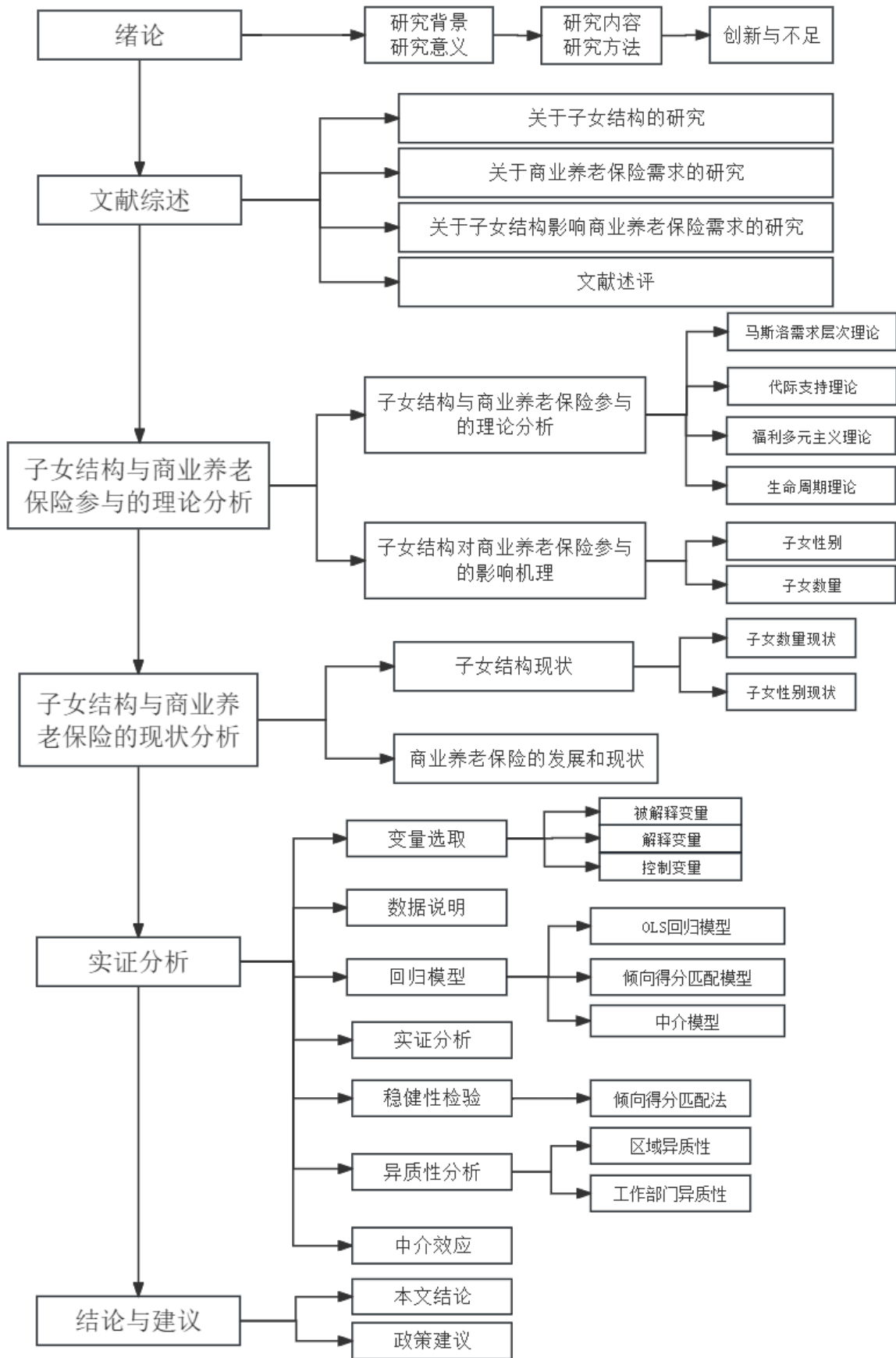
（2）过往文献大多采用基础回归分析方法，本文采用的是 OLS 回归和倾向得分匹配法相结合的方法。通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克服了传统回归分析中可能存在的样本选择偏差和内生性问题，更准确地揭示了保险领域中的因果关系。通过深入探讨保险市场的微观机制和个体行为，为保险市场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更为全面和深入的分析。

1.4.2 不足之处

（1）本文选取 2021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调查数据，该数据库中缺乏家庭在养老保险方面的保费支出、风险偏好等相关数据，使得本文缺乏子女结构对于商业养老保险保费支出水平、风险偏好的影响研究。同时，由于受新冠疫情等的影响，本次调查较以往的 CGSS 数据调查难度加大，因此在去除缺失项和无效项后，最终获得 4565 个有效样本。

(2) 商业养老保险的参与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经济因素等可量化指标的影响，而心理特征、政策变化等不可量化因素同样在其中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遗憾的是，由于本人学识有限，本文在分析过程中并未充分考虑这些非量化因素，这无疑和分析中的一个欠缺之处。

1.5 技术路线图



2 子女结构与商业养老保险参与的理论分析

2.1 基础理论分析

2.1.1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与商业养老保险参与

如图 2.1 所示，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中这些需求层次是逐渐增加的。人的安全需求可分为生理安全与心理安全两个方面。生理需求被视为最基础的需求，它涵盖了人的基本生存需求。在生理需求满足后，人们才会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安全需求主要包括生理层面与社会层面两个方面。个体的安全需求可以分为安全感和安全环境。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更多地集中在心理方面。随着年龄增长和社会经验增多，个体对这些方面的要求也将不断增加。只有当个体满足了基础的需求后，他们才会寻求更高级别的需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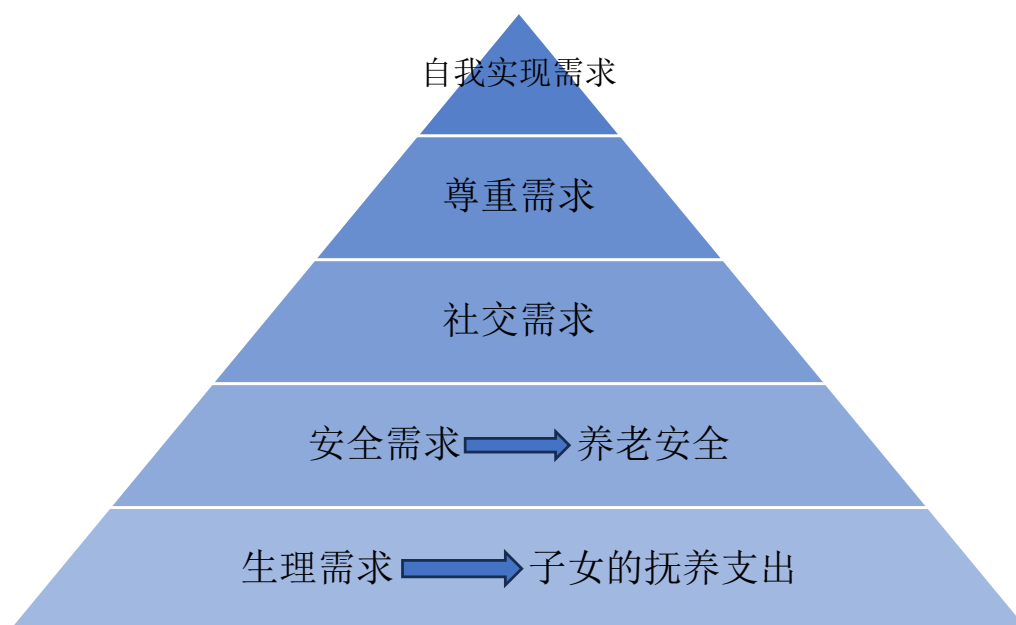


图 2.1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在研究子女结构对商业养老保险参与影响时，由于需求是先于参与行为的，本文在这里用商业养老保险需求代替参与行为进行分析。研究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指导下的商业养老保险参与行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保险被认为是一种对抗风险和补偿损失的策略，在约定事实发生后进行经济给付。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认为，每个人都有

一定程度的安全需求。对于养老保险参与行为就是要满足“养老安全”，因此它可以被看作是满足个人安全需求的一种方式。更明确地说，我们可以把“养老安全”看作是马斯洛需求理论中关于安全需求的一个更精细的分类。为了应对年老时财务上的不稳定性，确保个体在退休后的“养老安全”，他们需要在年轻时做好经济策略规划，商业养老保险正是满足这种安全需求的关键策略之一。养老保险的核心目标是确保老年群体的生活需求得到满足，它能为那些满足给付年龄的老人提供经济上的支持。

从安全需求来看，一个家庭首要的任务是满足子女的基本生活需求，即生理需求。其次是将收入用来支付子女的教育费用和医疗费用等方面。在家庭总收入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消费支出主要是为了满足这些基础生活需求。随着子女年龄的增长，经济决策者也慢慢处于承担抚养子女和扶养老人责任的阶段，经济压力通常较大。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政府自我养老的倡导，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自己的养老问题，不再是以前的等待子女接济，更多的偏向自己养老。而往往只有在满足子女和父母的需求之后，家庭成员才会开始为自己思考更高层次的需求，例如养老安全方面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负责经济决策的家庭成员可能会考虑购买商业养老保险来应对他们的养老风险，从而满足他们的安全需求。

社交需求和尊重需求也可能在家庭子女数量和性别与个人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参与度之间发挥作用。从社交需求的视角出发，人类天生具有与他人建立联系、形成社会群体并寻求归属感的本能。在家庭这一基本社会单位中，子女的数量和性别构成了一个重要的变量，它们影响着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模式、家庭关系的动态变化以及个体在家庭中的角色定位。子女的数量多少和性别分布，会直接影响家庭成员间的交流频率、情感联系以及责任分担等方面。这些因素进而会影响个人对家庭未来的担忧和规划，包括对养老保障的需求和态度。当家庭子女数量较多时，一方面父母可能会更加关注未来的养老问题，以确保能够在经济上和精神上给予子女足够的支持。另一方面，也可能使父母产生子女会在他们需要时提供支持的预期和依赖感，使得他们不太愿意主动购买养老保险。而子女性别不同也可能导致家庭成员在养老规划上的不同侧重点和参与度。从尊重需求的视角出发，尊重需求涉及个体对自我价值和社会地位的追求。我国传统观念认为“多子多福”，多子女家庭被视为家庭繁荣和社会地位的象征，这种社会认同可能会增强家庭成员对养老保障的重视程度。因为拥有更多的子女可能意味着更大的家庭责任和社会期望，这可能会促使家庭成员更加积极地规划未来，包括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以确保自己和家庭的稳定与安全。

2.1.2 代际支持理论与商业养老保险参与

代际支持理论是指在家庭模式中，父母与子女两代人之间存在的经济互惠、生活互助和情感支持行为。并且这种支持行为是双向的，即子女对父母的代际支持和父母对子女的代际支持。目前对代际支持理论的解释主要包括利他主义理论和代际交换理论。接下来将分别基于两种解释理论进行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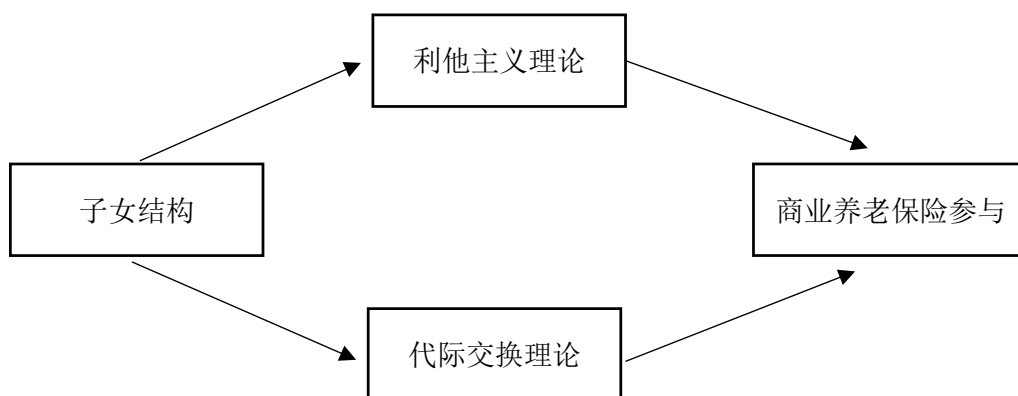


图 2.2 代际支持理论与商业养老保险参与

利他主义理论认为，家庭成员多为利他主义者，他们甘愿无私地分享个人资源，以增进家庭成员的整体福祉。家庭代际支持的本质在于家庭利益的合理分配。在家庭中，父母出于无条件的爱，全心全意地抚养子女，并不寻求任何形式的回报。这种无私的爱，驱使父母愿意为家庭的开销和子女的成长承担经济风险，倾尽所有。与此同时，代际交换理论则主张，家庭内部的代际关系建立在资源交换的基础上，这种关系呈现出一种相互协作的特点。根据代际交换的动机理论，育儿行为实质上是一种“付出与回报”的交换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同代际之间的资源流动是相互支持的，且具备可交换性。这种代际交换关系建立在双方回馈的能力和意愿之上，父母与子女在这种关系中处于平等的地位。他们通过交换行为，旨在获取对方的可用资源，并尽最大限度地为对方提供利益。

依据利他主义理论，父母基于亲情不仅愿意为减轻孩子的生活压力而付出，而且极不希望成为孩子的负担或拖累，甚至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孩子提供各种形式的支持。而从代际交换理论的视角来看，父母在年轻时抚养子女，待到年老时则依赖子女的赡养，是一种“抚养——赡养”的交换关系。这种行为的动机主要分两类：经济上的赡养和心理上的赡养。经济上的赡养就是依靠子女给予生活费或养老院等，精神上的赡养主要指

子女在日常生活中对父母的照料和情感慰藉。从代际交换理论来分析，这种交换也并非简单的物质金钱交易，而是蕴含着深厚的亲情与责任。因此，家庭的子女结构对家庭消费产生的影响必然会在不同代际支持和代际交换动机的情况下产生不同，从而影响家庭商业养老保险的参与情况。

2.1.3 福利多元主义理论与商业养老保险参与

福利多元主义（Partialism）是近年来研究社会政策新的理论研究范式，倡导打破政府垄断，由多个主体共同提供社会福利。20世纪50年代以来，福利多元主义发展成为一种以强调不同国家、地区和部门之间的制度差异为核心的社会理论，这一理论在解释社会经济现象时强调国家和市场、个人之间的关系。该理论坚持福利是社会全员的成果，福利的提供应当由国家、社会、市场和个人等多方主体承担共同的责任。国家是重要主体，但不是唯一来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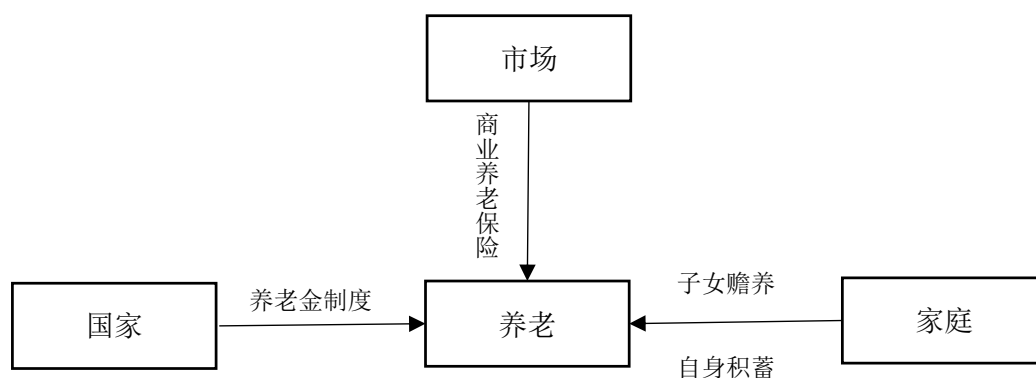


图 2.3 福利多元理论与商业养老保险参与

基于这一视角，政府在构建养老保障体系中承担着无可替代的关键职责，尽管其并非唯一的养老服务供应方，因为市场的力量同样不可或缺。同时，家庭在养老保障机制中自始至终承载着基石性的功能。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老龄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养老早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性问题，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在这个过程中，养老保障的供给主体也在不断增加，传统单一的供给方式已经无法满足现代社会对养老保障的需求。因此，如图 2.3 所示，需要政府、市场、家庭等多方共同参与，形成多元化的养老保障供给体系，以更好地应对养老挑战。

在国家、市场和家庭这三个层面上，它们各自拥有独特的优势，可以相互替代和发展，实现合作与竞争的完美结合。家庭养老是社会养老的基础与核心，也是解决人口老龄化所带来一系列问题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因此，居家养老始终是起到核心作用的老方式。我国现阶段仍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单纯依靠家庭养老和政府对于老年人的经济支持是不足够的，市场还需要提供相应的商业养老保险产品。三个部门之间存在相互补充和相互影响的关系。家庭购买养老保险的经济决策常常受到家庭内部状况的影响，特别是与需要抚养的子女状况有关。当子女数量增加时，未来来自这些子女的养老保障也会相应增加，这可能会导致他们不倾向于购买商业养老保险。同样，子女数目越少的老人越倾向于选择商业养老保险进行养老保障。当家中仅有女儿时，养老保险的需求可能会上升，从而对商业养老保险的参与度产生影响。

2.1.4 生命周期理论与商业养老保险参与

生命周期理论，这一经济学的重要观点诞生于上世纪 50 年代，其提出者是莫迪利安尼（F·Modigliani）。该理论认为，消费者在其整个生命周期中，进行消费决策时会将其收入的分配情况纳入重要考量范围。该理论将生命周期细分为青年、中年和老年三个阶段，并指出个人会根据自己所处阶段的经济状况来做出最合理的支出决策。

具体来说，在人生的早期阶段，即青年期，个人通常处于就业初期，收入水平相对有限，但伴随职业发展预期会有可观的收入增长潜力。在此阶段，收入往往正好满足或无法个人的支出需求。这往往会导致储蓄行为受到限制，不得不借助贷款以维持消费需求。进入中年阶段后，随着职业生涯的成熟，家庭总收入很可能达到峰值并保持在一个较为恒定的状态，此时，家庭财务管理的重点转向为孩子的高等教育储备资金以及为应对退休后的养老金缺口做足准备，因此，会倾向于抑制即时消费，转而加大储蓄力度和投资布局。待步入老年阶段，由于退休生活的开始，收入来源急剧减少，主要依赖于固定养老金和其他非劳动所得。这时，中年积累下来的财富储蓄便成为支持日常生活花费的主要依托。基于这样的生命周期假设，个人应当合理规划自己的消费与储蓄，制定符合自身生命周期特点的经济计划，以实现消费的和谐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本文研究聚焦于有子女的人群，他们往往是青年和中年人群。作为家庭的经济决策者，即家庭的核心成员，其消费行为和储蓄决策对商业养老保险参与具有显著影响。因此，有必要探讨他们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如何规划消费与储蓄，以应对未来的养老风险。根据生命周期假设理论，青年和中年时期是个人收入显著增长的阶段，经济状况明

显改善。在这一时期，个人不仅会努力偿还年轻时的债务，更会积极为未来的老年生活做打算，以确保经济的稳健性和可持续性。这种前瞻性的消费和储蓄规划不仅促进了当前的消费活动，也为规避老年风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外，随着收入的增加和经济状况的改善，人们往往倾向于购买商业保险来规避潜在的风险。特别是对于商业养老保险，中青年人群在收入稳定增长的背景下，展现出了强烈的购买意愿。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为自己的老年生活提供更为可靠的经济保障。

个人的成长与家庭紧密相连，生命周期理论也揭示了个人与家庭之间的经济联系。在青年和中年时期，个人需要偿还的债务不仅包括自身年轻时的开支，还涵盖了上一代甚至两代家庭在抚养和教育自己时所付出的成本。当个人成为家庭的中坚力量时，他们不仅要为上一代人的养老买单，还要承担抚养和资助下一代的责任，如子女的生活和教育支出等。当子女数量较多时，青年及中年时期的家庭决策者通常需要将更多的现期收入用于抚养和教育子女，以满足他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和成长发展。这意味着家庭可用于其他方面的支出，如购买商业保险或进行储蓄和投资，可能会受到一定限制。另一方面，如果家庭中的男性子女比例较高，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决策者可能会更加倾向于储蓄。这是因为男性子女在成年后通常面临结婚、购房等重大开支，家庭决策者需要提前规划并积累足够的资金以应对这些支出。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家庭经济状况有所改善，家庭成员也可能会因为顾虑商业保险的缴费连续性等特点，而难以通过购买商业养老保险来规避养老风险。此外，当家庭决策者进入中老年阶段时，他们对养老保险的需求通常会降低。这是因为在这一阶段，子女已经长大成人并开始为家庭提供经济支持。此时，决策者可能不再需要依赖商业保险来保障自己的养老生活，而是更多地依靠子女的赡养和家庭的积蓄。

2.2 子女结构对商业养老保险参与的影响机理

2.2.1 子女数量对商业养老保险参与的影响

在探讨子女数量对商业养老保险参与的影响时，我们发现这一因素的作用路径并非单一，而是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如图 2.4 所示，其影响主要可以归结为两大方面。一方面，子女数量的变化直接影响着家庭的抚养支出，进而影响了家庭可支配收入，间接影响了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能力；另一方面，子女数量作为家庭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间接影响着家庭成员的养老观念，从而影响了商业养老保险的参与度。接下来，将结

合图 2.4 的详细内容，对这两大影响路径进行深入剖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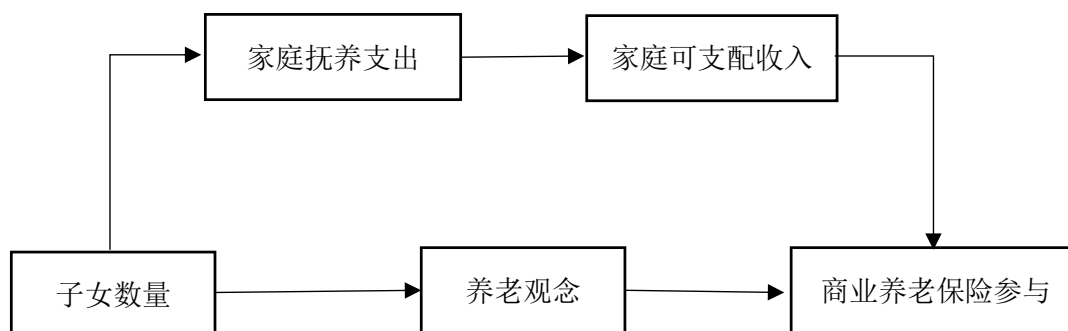


图 2.4 子女数量影响商业养老保险参与路径

家庭抚养支出受子女数量影响，进而影响家庭可支配收入，最终影响商业养老保险参与。时至今日，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日益提高，生活成本也持续增加。尤其是家庭抚养支出，不仅涵盖了基本的生活需求，更延伸至教育、兴趣培养等多个方面。子女数量的增加直接导致了家庭抚养总支出的上升。他们愿意在经济能力范围内为子女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选择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同时，随着教育理念的进步，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投入也在不断增加，包括各种补习课程、兴趣班等，旨在培养孩子的综合素质。此外，随着家庭抚养支出的增加，家庭可支配收入相应减少，这直接影响了居民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能力。商业养老保险作为一种重要的养老保障方式，其购买需要家庭具备一定的经济基础和支付能力。然而，当家庭抚养支出占据较大比例时，家庭决策者可能会优先考虑满足子女的抚养需求，而非购买商业养老保险。而当家庭中的子女数量为零时，家庭经济决策者无需承担抚养责任，因此可以更加自由地根据自身的经济状况来决定是否购买商业养老保险。

子女数量也通过影响个体的养老观念来间接作用于商业养老保险的参与情况。在传统观念中，“多子多福”的心态普遍存在，许多人认为子女数量多意味着老年时期有更多的养老保障。这种心态可能导致那些子女数量多的家庭决策者低估养老风险，减少对商业养老保险的需求。然而，随着时代的进步和观念的转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子女数量并非养老保障的唯一因素，尤其是在现代社会中，子女可能因各种原因无法充分承担养老责任。因此，那些子女数量较少或没有子女的家庭决策者可能更倾向于通过购买商业养老保险来转嫁养老风险，从而增加对商业养老保险的需求。

结合以上分析可以做出总结，子女数量对商业养老保险参与的影响主要体现于两方面：一是抚养责任增加导致家庭经济压力上升，可支配收入减少，制约商业养老保险购买；二是在传统观念下，子女必须承担父母的养老义务，而多个子女越能分担养老风险，从而减少购买意愿，而少子或无子则可能增加购买需求以规避养老风险。

2.2.2 子女性别对商业养老保险参与的影响

子女性别通过“养儿防老”传统观念，对个体的商业养老保险参与产生影响。一般来说，女性子女在结婚后会脱离原生家庭与配偶独立居住或和配偶的家人住在一起，而家庭中的男性子女是始终与父母密切联系，绝大多数居住在同一屋檐下的。而女性子女在结婚后，常常被评价为“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一方面是原家庭在心理上容易觉得女儿已经脱离出去，更多的要承担孝敬公婆的责任。另一方面是女性子女与父母的物理距离增加，增大了身体力行照顾父母的难度。因此，男性子女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更多，照顾父母的时间也越多。久而久之，家庭普遍认为“养儿防老”，只有儿子能在身边全身心的照顾自己。同时，从逻辑的角度出发思考，正是由于大家觉得“养儿防老”的观念是合理的，所以也必然导致部分家庭向男性子女投入更多资源，更加注重男性子女的培养。

除此之外，我国长期失衡的性别比例使得适龄男性数量远远大于适龄女性，这使得女性在婚姻市场上更具主动权。在婚恋对象的选择上，男性面临更大的竞争力，需要在个人资产、工作能力、家庭经济实力、社会地位等因素较为突出。而这些不仅依赖于家庭对男性子女的资源投入及其个人努力，也取决于家庭愿意为儿子婚姻付出的资源。在我国根深蒂固的家庭观念中，男性子女的婚姻问题一直是重中之重，人们普遍认为“先成家后立业”是男性人生道路上不可或缺的一环。然而，由于子女性别的不可预知性，那些拥有男性子女的家庭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他们在婚姻市场中可能遭遇的不利局面。为了增强男性子女在竞争激烈的婚姻市场中的竞争力，家庭经济决策者往往倾向于为他们投入更多的资源和精力。相比之下，女性在婚姻市场中通常展现出更多的主动性和选择权，特别是在那些同时拥有女性和男性子女的家庭中，家庭对于女性子女婚姻问题的资金投入通常较为有限。这种现象表明，尽管男性子女在婚姻市场中可能面临竞争劣势，但这种劣势反而成为他们在家庭资源分配中的优势所在。

投资男孩往往能带来更高的回报这一点在贝克尔所写的《家庭论》中也有突出体现。深入分析我国的社会现状，可以发现传统观念依然深入人心。这些观念导致女性更多地

承担起家庭和育儿的责任，从而使得男性在职场中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在薪酬水平方面，男性往往更容易获得高薪职位，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对于不同性别角色的期待和定位。除了男性在职场上具有优势，男性在体力方面也通常优于女性。在涉及体力劳动的家庭中，男性往往比女性展现出更大的优势。这使得他们在家庭劳动和农业生产中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家中有男孩的家庭在亲戚朋友间往往能够获得更多的支持和帮助，这也进一步增强了他们在社交场合中的话语权。

因此，家庭在做出经济决策时，往往会考虑到男性子女带来的潜在回报和优势。这种考虑不仅体现在对子女的教育投入上，也反映在家庭的资产配置和养老规划等方面。在进行资产配置时，他们更有可能把养老的期望寄托在男性子女身上，这种直接的赡养行为可能会减少对商业养老保险的参与，从而更倾向于进行理财类或保守类的投资。这也给保险公司在产品设计和目标人群定位方面提供了启示。

3 子女结构与商业养老保险的现状分析

鉴于本文选取子女结构的定义为子女数量和子女性别构成，本章将对我国的子女数量和子女性别现状以及商业养老保险发展与现状进行分析，通过多重指标分析子女结构与养老保险市场的发展近况。

3.1 子女结构现状

随着我国生育政策的不断调整和变革，家庭子女结构也正在经历相应的调整。“独生子女”政策曾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实施以来确实对我国的人口结构和社会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这一政策的影响下，我国的出生率持续下降，出生人口性别失衡问题逐渐凸显，家庭规模逐步缩小，进而导致家庭内部的保障功能下降等问题逐渐显露。以下是我国家庭子女结构的现状：

3.1.1 子女数量现状

(1) 生育意愿不足，生育率持续下降

生育率^①是最直接影响子女数量的指标，生育率的变化直接影响着子女数量的增减。当生育率较高时，每位女性生育的子女数量增多，从而导致整体子女数量的增加；反之，生育率下降则会导致子女数量减少。生育率的波动和趋势对于家庭和社会的人口结构具有重要的影响。高生育率可能导致人口增长速度加快，增加了家庭的经济负担和社会资源压力；而低生育率则可能导致人口老龄化问题和劳动力短缺。

如图 3.1 所示，自从我国在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生育率一直呈下降趋势。且进入 21 世纪后，我国已经步入了一个超低生育率的阶段，并长时间维持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上。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未来面临着巨大的人口压力和养老压力。到 2020 年，我国已经陷入国际公认的低生育陷阱。究其原因，主要是在新时期人口发展背景下，人们对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发生改变。当前，许多处于生育年龄的年轻人受到“少生优生，幸福一生”等计划生育文化的影响，他们的生育意愿相对较低。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通过提高生育质量来实现人口均衡发展，已经成为国家和社会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之一。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国推出三孩政策，

^①又称总和生育率，反映一名妇女在每年都按照该年龄别现有生育率生育的假设下，在育龄期间生育的子女总数。按照国际标准，生育率低于 2.1 称为低生育率，低于 1.5 称为超低生育率。一般来讲要想完成世代更替，生育率至少要达到 2.1。

但是该政策及其配套措施对于提高生育率的效果仍然不是很显著，过高估计放开生育政策对生育率提升的影响。2022 和 2023 年我国生育率分别约为 1.15 和 1.09，2023 年据预测仅比韩国最新公布的 0.72 略高，数据在世界上人口过亿的国家中属于最低生育水平，值得社会警惕。鉴于当前的发展趋势，预测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将继续保持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生育意愿低迷的现状仍会持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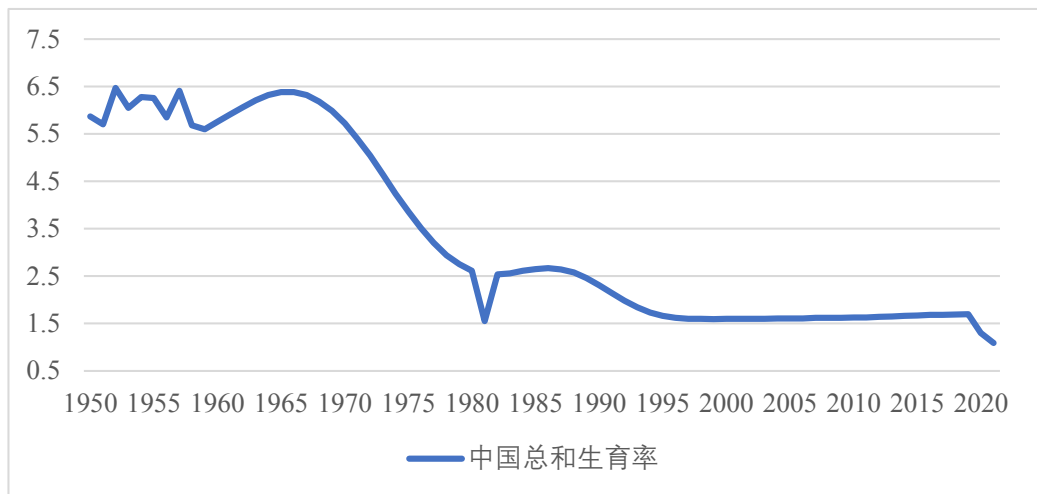


图 3.1 1950-2022 年我国生育率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

此外，我国人口出生率也在经历持续下降的过程。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我国于 2015 年开始实施全面二孩政策，2016 年出生人口出现回升。不过，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并未达到预期目标，而三孩政策亦未带来显著效果，中国出生人口的下降趋势未能扭转，生育堆积效应已基本结束。至 2022 年，中国的出生人口已经开始负增长，连续七年走低。截至 2023 年，出生人口仅有 902 万人，比 2022 年减少 54 万人，继续创新低。根据《中国人口预测报告 2021》中的方案，到 2050 年，我国的出生人口将降至 773 万，仅为印度人口的 1/3，而到 2100 年，这一数字更将降至 306 万，仅为印度人口的 1/4。

（2）平均子女数持续下降

我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初期，平均子女数较高，约为 2.5 到 3 个左右。随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平均子女数开始逐渐下降。在面对生育决策时，越来越多的家庭会将子女数量增加带来的经济负担、集中教育资源提升子女教育质量、个人发展纳入考量范围。目前，我国的平均子女数已降低至 1.3 到 1.6 个左右，并且表现出明显下降趋势。

（3）家庭规模缩小

自新世纪开始，我国的家庭平均规模一直在逐渐缩小。在此背景下，我国人口出生率逐渐降低。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和新型生育观念的普及，年轻人的生育观念发生了变化，家庭规模的小型化趋势变得越来越明显。如图 3.2 所示，可知我国从 1953 年到 2020 年的全国人口普查中家庭的平均规模如何变化，从中可以直观地观察到其逐渐下降的趋势。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2020 年中国大陆地区的平均家庭户规模为 2.62 人，这比 2010 年的 3.10 人减少了 0.48 人，已经低于“三口之家”的最低标准。这也意味着中国人口结构出现重大变动，家庭的平均规模持续下降，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生育的观念已经发生了转变，家庭规模的缩小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的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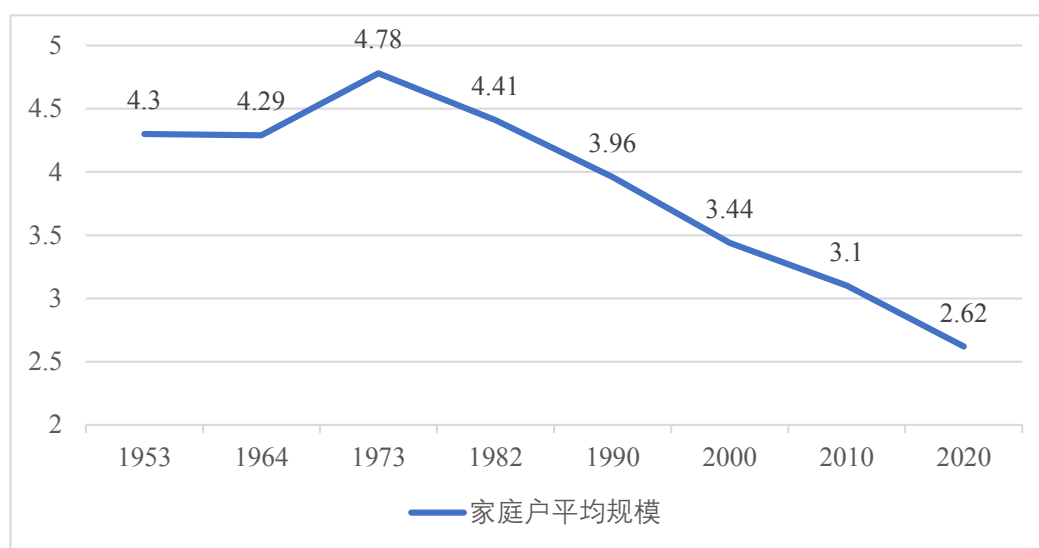


图 3.2 1953-2020 年我国家庭户平均规模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

3.1.2 子女性别现状

（1）男女比例失衡

出生人口性别比^①主要是反映未来人口的性别比例。我国的出生性别比从 1982 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的时候开始超出正常区间。此后的历次普查，性别出生比都不正常。根据图 3.3 的数据显示，自 1982 年的第三次人口普查开始，我国的出生人口中的性别

^①是一段时期内某地区每出生 100 个女婴，同时出生了多少个男婴。主要是反映未来人口的性别比例。通常情况下，正常的新生婴儿的出生性别比例应该集中在 103~107 之间。若出生性别比例低于 103，则被归类为出生性别比偏低；当出生性别比例在 103~106.9 之间，则处于正常范围；若出生性别比例高于 107，则被归类为出生性别比偏高，而当出生性别比例超过 130 时，则被定义为极度偏高。

比例明显呈上升态势。这一趋势在 2004 年达到顶峰，但随后开始逐渐回落。近年来，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持续落实和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出生人口比例不断降低。随着我国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持续进步，以及国家基本政策的引导，“男女平等”的理念逐步被广大人民所接受，从 2015 年开始，我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呈现出稳定的下降态势。目前我国正处于从传统生育文化向现代新型生育文化转型过程中，家庭结构、经济收入、教育程度都发生了较大变化，人们对于女性地位也有更多认识。尽管如此，“男尊女卑”和“传宗接代”的传统观点依然根深蒂固，大众对于男性后代的偏爱也仍然普遍存在，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问题依然十分严峻。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的出生人口中的性别比例依然高达 111.3，这一数字超出了国际上普遍接受的性别比例标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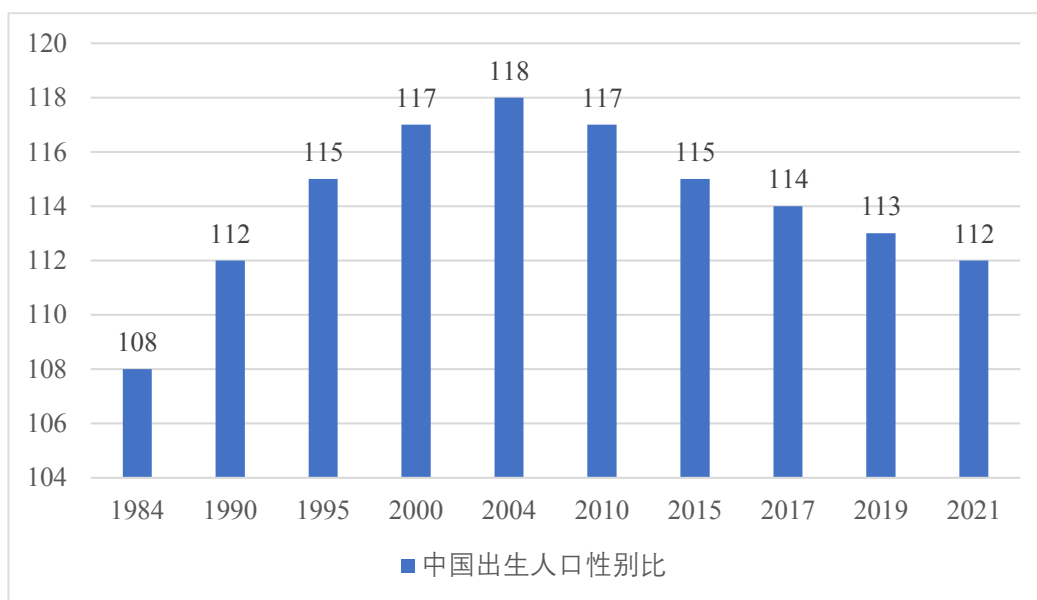


图 3.3 1984-2021 年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

(2) 对子女性别的偏好

中国社会对儿子的偏好程度较高，主要源于以下几个原因：传统观念认为男孩能够继承家族血脉、承担更多家庭责任，是家族延续的重要人物；男孩被认为能够带来更多经济收益；社会压力，生育儿子以满足社会对男性的期望。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中国社会对儿子的偏好程度较高。

在不同地区，家庭对子女性别的偏好程度可能有所不同。一些农村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家庭对男孩的偏好更为明显。这种偏好导致了一些家庭可能会通过性别鉴定

技术来选择生育男孩，从而加剧了性别比例失衡。

3.2 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与现状

3.2.1 商业养老保险市场及政策

(1) 养老保险整体保障规模和渗透率仍然不足

我国养老保障体系包括“三支柱”，第一支柱一般为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由政府强制性实行，满足退休人群最低生活保障；第二支柱作为对基本养老保险的补充，由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共同组成，提供最低生活保障之上更优质的养老生活；第三支柱旨在提高退休后的生活水平，寻求多元化、偏好性强的退休生活保障，以商业养老保险为主。

根据社科院《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 2019-2050》，城镇企业养老保险目前的结余状况呈现出不同口径。当结余为 0 时，表示支出已经超过收入。由于我国对第一支柱的依赖过高，基本养老金的支出与收入比例从 2012 年的 76% 上升至 115%，显示支出已超过收入。到 2020 年，基本养老保险首次出现收支不平衡，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出现近 7000 亿的缺口。根据社科院的研究预测，第一支柱养老金的结余可能在 2035 年左右耗尽，这将给我国的养老保障体系带来极大的压力。因此，大力推进养老保险第三支柱的发展迫在眉睫。

(2) 金融市场发展欠成熟，监管机制不健全

由于金融市场不成熟，商业养老保险存在信息不对称从而引发道德风险问题，消费者对保险公司的信任危机突显。同时，商业养老保险能够蓬勃发展的关键是金融市场波动小且收益稳定，而我国企业年金收益率变动较大，导致消费者对商业养老保险更加不信任。此外，当前对保险行业的监管尚缺乏专门性法规，需要不断提高行业门槛，促进行业健康发展，并吸引更多保险专业人才以赢得消费者的信任。

(3) 税收激励力度及范围不足

2018 年 6 月，我国开始试点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产品，2022 年 1 月起，对个人养老金实施递延纳税优惠政策。但当前第三支柱税收激励实际覆盖范围较小，根据领取时 3% 的实际税负，预计仅有 6000 万~7000 万人能享受个人养老金税收优惠政策，保险公司售卖商业养老保险和投保者领取保险金时仍需按比例缴纳税金，导致保险公司缺乏创新与宣传动力、个人投保者的预期逐渐下降。

3.2.2 商业养老保险产品及用户

(1) 养老金投资收益波动幅度大

商业养老金在投资运营过程中面临着很大的风险。养老金投资收益会受到宏观经济环境、金融市场波动、投资组合配置、投资期限和策略、政策变化和监管调整、风险管理能力以及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等因素的影响。而市场波动和投资组合配置不当等问题导致养老金投资收益不稳定,会给投保人的养老金保障带来一定压力。这种不确定性使得投保人在选择商业养老保险时更加谨慎。因此,为了降低养老金投资收益的波动性,需要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制定合理的投资策略和风险管理措施。

(2) 商业养老保险种类单一、功能不全

我国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相对单一,缺乏差异化和创新性。目前市场上的商业养老保险产品主要集中在传统型养老保险和分红型养老保险,这些产品通常具有固定的保费支付期限和固定的养老金领取方式,缺乏灵活性。而对于投资型养老保险、变额型养老保险等创新型产品的开发和推广相对较少。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商业养老保险市场的发展潜力和吸引力。

目前我国大部分商业保险公司主要通过提高回报来吸引潜在消费者。但比起高回报,消费者的风险承受能力与年龄呈负相关,往往倾向于稳健型投资。同时,随着年龄的增长,消费者的医疗支出也逐步增加,商业养老保险与长期护理、医疗服务等相结合,如何与寿险相辅相成会是吸引消费者的亮点。除此之外,获取养老保障的方式也是消费者关心的一大问题,流动性强、有最低累计利益保证的变额年金有更强的吸引力。因此,多元化、个性化的商业养老保险是关键。

(3) 养老保险目标用户趋向年轻化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口结构的变化,年轻人群体在消费上呈现出个性化、多元化和数字化的特点。他们注重生活品质,追求个性化体验,同时善于利用数字化工具进行消费决策。这种消费习惯与水平的变化,使得年轻人群在保险需求上也呈现出新的特点。他们更倾向于选择灵活、便捷、个性化的保险产品,以满足不同阶段的生活和职业发展需求。在养老保险领域,这一趋势尤为显著。年轻人群生育意愿不高,对养老保险的需求日益增长,他们更加关注未来的养老规划和保障,期望通过合理的保险安排,确保自己在老年时能够享有稳定的经济来源和生活品质。在这种背景下,保险目标用户趋向年轻化成为必然趋势。

（4）科技赋能商业养老险创新

保险行业的数字化升级，为产品设计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它打破了传统产品同质化的困境，使保险公司能够根据市场需求和用户特点，进行更加精准和差异化的产品设计。科技赋能不仅能缩短产品的研发周期，提高开发效率，还能使产品最大程度地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通过数据分析和挖掘，保险公司可以深入了解年轻用户群体的消费习惯、风险偏好和养老规划需求，从而设计出更符合他们实际需求的养老保险产品。同时，利用数字化平台，保险公司能够实现产品的快速迭代和优化，及时响应市场变化和用户反馈，不断提升产品的竞争力和用户体验。此外，数字化升级还使得保险产品的推广和销售更加便捷和高效。通过线上渠道和社交媒体平台，保险公司可以更加广泛地触达潜在客户，实现精准营销和品牌推广。与此同时，数字化服务也可以提高客户的满意度和忠诚度，为保险公司的长期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4 子女结构对商业养老保险参与影响的实证研究

4.1 数据来源

本文实证研究选用 2023 年 3 月份最新公布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数据类型为 2021 年的截面数据，数据总个体样本量为 8148 个，符合大样本性质。通过多阶分层抽样对采访人员进行面访，采访人员年龄控制为 18 岁以上的成年人，准确性更高。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最早开始于 2003 年，目前已经进行了 11 次的全国调查采访，采访问题涉及社会、社区、个人和家庭多个层次维度，通常被用于连续性截面数据分析。

在展开实证分析之前，本文对 8148 个原始数据做了以下预处理。首要步骤是排除 65 岁以上的受访者，专注于 18 岁至 65 岁这一年龄段的受访者问卷。主要是根据本文研究主题——研究商业养老保险参与的影响因素。在保险市场，大多数保险公司将参保年龄控制在 60 岁以内，但随着老龄化严重，参保年龄在一些公司也被放开到 65 周岁。因此，本文数据将剔除 65 岁以上的受访对象，将 18 岁至 65 岁的受访者问卷作为本文研究的样本数据。其次，本文研究的主要是子女数量的多少对商业养老保险参与的影响程度，因此剔除了子女数量为 0 的家庭。最后，出于对数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的考虑，通过 Stata 软件将原始数据中缺失或无法准确识别的样本进行筛选剔除。经过一系列的处理，最终得到 4565 个有效样本，仍符合大样本性质，为后续的实证分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2 变量选取及其说明

导致商业养老保险参与程度受影响的因素可归纳为三类。第一类是经济方面，主要考虑经济体制、经济发展水平、通胀率、利率等，它们共同构成了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的经济环境。第二类是社会方面，主要关注地区总体的保险意识和社保的实施情况，反映了商业养老保险的普及程度、居民接受度以及现有的保障水平。第三类是人口方面，可分为个人微观层面和家庭层面。在个人层面上，考虑因素主要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况、身体健康情况等。在家庭层面上，主要涵盖家庭规模、家中老年人占比、子女数目和性别等。因此，为了研究子女数量和性别对商业养老保险参与的影响，考虑到数据获取问题，本文最终决定从个人、经济和社会因素上进行控制变量的设定。

4.2.1 被解释变量

问卷中的 A61 询问“您目前是否参加了以下社会保障项目？”其中 A61_4 表示商业性养老保险，赋值为 1 代表受访者参加了商业性养老保险，赋值为 0 代表受访者未参加商业性养老保险。本文将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分析，以此衡量商业养老保险的参与可能性。

4.2.2 解释变量

(1) 子女数量

由于本文采用了两种模型来进行分析，子女数量也需针对性的用不同方式进行衡量。在倾向得分匹配法中，自变量必须是二元变量，因此子女数量用“受访者子女是否是独生子女”来衡量。只有一个子女，赋值为 0；多子女则赋值为 1。而在 OLS 回归中，对其不做要求，所以在子女数量用“受访者儿子和女儿数量的总和”来衡量。在子女数量对商业养老保险参与的影响方面，尚未得到共识，因此本文从微观的角度为此研究是较为有必要的。

(2) 子女性别

本文参考已有学者的研究，设定子女性别为一个虚拟变量，将有子女的家庭分为两类：有儿子的家庭，只有女儿的家庭。有儿子的家庭指定为 1，只有女儿的家庭指定为 0。通过比较两类家庭之间的差异来研究性别对商业养老保险参与的影响。

4.2.3 中介变量

基于以上分析可知，子女结构会影响家庭抚养支出进而影响家庭可支配收入，家庭可支配收入又与商业养老保险参与相关，而全年家庭总收入是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决定因素，可能在子女结构与家庭养老保险参与之间起到中介效应，因此本文选取全年家庭总收入作为中介变量。

4.2.4 控制变量

根据前文的分析，本文最终主要从个人特征、家庭经济水平、社会保障水平三方面选取相关控制变量。其中个人特征除了主流使用的变量外，增加了养老观念。

(1) 个人特征变量

“性别”采用问卷中 A2 访问员记录的性别，赋值为 1 则受访者是男性，赋值为 0 则受访者为女性。不同性别往往思考问题的方式和侧重点不同，从而可能会影响居民对商业养老保险的参与。“年龄”为受访者当年年龄，用受访年份 2021 减去 A3 中出生日期的年份得到其年龄。在年龄逐渐增加的过程中，受访者的财富水平也会不断上升，思想观念以及思考问题的方式也会随着阅历的提升而产生变化，进而使商业养老保险参与受到影响。除年龄外，对年龄的平方进行进一步的分析，期望可以探讨年龄与商业养老保险参与之间存在的非线性关系。“婚姻状况”根据问卷 A69 询问的具体回答，将同居及在婚状态赋值为 1，无配偶及丧偶状态赋值为 0。婚姻状况的不同，会导致家庭的经济来源和支出范围不一样，而且也会影响个人安全感最终影响是否购买保险。“健康状况”方面，将问卷 A15 询问受访者当前身体健康状况的回答中，选择含有不健康的选项均赋值为 1，选择一般、含有健康的选项赋值为 0。身体健康的人往往拥有较高的生活质量，对自己饮食等方面较为严格。他们对自己的预期寿命持有更为乐观的态度。这种积极的预期使得他们更倾向于为未来的养老生活做出更为长远和全面的规划，而购买商业养老保险就成为他们实现这一规划的重要手段。“养老观念”由问卷 A41 中受访者认为有子女的老人的养老主要应该由谁负责这个问题的回答进行赋值。若受访者认为应由子女负责，赋值为 1，相反认为不应该子女承担主要责任的赋值为 0。主要因为在不同的养老观念下，会产生不同的养老预期，做出不同的养老规划。依赖子女负责养老的人群会更倾向于依赖子女的照顾从而减少对商业养老保险的参与。

(2) 家庭经济水平

商业养老保险的参与行为建立在个体或家庭具备相应的支付能力与购买意愿的基础之上。而家庭经济状况就是其中一个核心因素，它直接决定了可用于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资金规模。通常情况下，家庭经济水平越高的个体或家庭，其可支配收入也相对较高，因此他们拥有更多的资金用于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以此来提升未来的养老保障水平。但这也不是绝对的，一部分资金充裕的家庭可能倾向于养老风险自留，即通过家庭内部的资金积累和配置来应对未来的养老需求。这种选择基于他们对自身财务状况的自信，以及对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特性、市场状况或信任度等方面的考虑。

问卷 A64 询问受访者的家庭经济状况在所在地属于哪一档。根据问卷结果进行赋值，当受访者认为自己的家庭经济状况远低于平均水平时，赋值为 1，低于平均水平时，赋值为 2。然后按照规律依次进行赋值，数值越大受访者的家庭经济状况越好。同时，

经济水平也能通过家庭汽车拥有情况和家庭房产拥有情况反映，经济水平高的家庭汽车和房产也是必备，将其持有情况作为控制变量之一，持有则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

(3) 社会保障水平

社会基本养老保险，作为一种国家政策性保险，旨在为社会成员提供基本的养老生活保障，确保老年人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或丧失劳动能力后，能够维持基本的生活水平。由于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在保障范围、保障水平和运作机制等方面存在一定的重叠，因此两者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具体来说，当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的保障水平较高时，部分人群可能会减少对商业养老保险的需求，因为他们已经通过社会基本养老保险获得了足够的养老保障。反之，如果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的保障水平较低，无法满足部分人群的养老需求，那么他们可能会选择购买商业养老保险来弥补这一不足。

本文用社会基本养老保险来衡量社会保障水平，与本文主题更贴近。将 A61_2 受访者目前是否参加了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的回答进行赋值，以此来探究社会保障水平对商业养老保险参与的影响。若受访者参加了社会基本养老保险赋值为 1，没有参加社会基本养老保险为 0。本文所有的变量及赋值如表 4.1 所示。

表 4.1 变量的含义及赋值表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赋值方法
因变量	是否购买商业养老保险	是=1，否=0
自变量	子女数量	子女数量之和
	子女数量 PSM	只有一个子女=0，多子女=1
	子女性别	有儿子=1，只有女儿=0
	受访者性别	男=1，女=0
控制变量	年龄	受访者实际年龄
	年龄的平方	受访者实际年龄的平方
	婚姻状况	在婚（有配偶）和同居=1，未婚、离婚和丧偶=0
	健康状况	比较不健康、很不健康=1，一般、比较健康、很健康=0
	养老观念	养老主要由子女负责=1，养老并非主要由子女负责=0
	经济状况	远低于平均水平=1，低于平均水平=2，平均水平=3，高于平均水平=4，远高于平均水平=5
	房产拥有情况	有=1，没有=0
	汽车拥有情况	有=1，没有=0

续表 4.1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赋值方法
控制变量	是否参加社会基本养老保险	参加=1, 没有参加=0
中介变量	全年家庭总收入	Ln(全年家庭总收入金额)

4.3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在对样本数据进行处理后,最后得到的样本数量为 4565 个。如表 4.2 为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现就其描述性统计进行简单描述。

表 4.2 描述性统计表

变量名称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是否购买商业养老保险	4565	0.0850	0.280	0	1
子女数量	4555	1.712	0.824	1	11
子女数量 PSM	4565	0.545	0.498	0	1
子女性别	4565	0.754	0.431	0	1
受访者性别	4565	0.412	0.492	0	1
年龄	4565	48.78	10.72	18	65
年龄的平方	4565	2494	1008	324	4225
婚姻状况	4565	0.911	0.285	0	1
健康状况	4565	0.157	0.363	0	1
养老观念	4565	0.585	0.493	0	1
经济状况	4565	2.557	0.759	1	5
房产拥有情况	4565	0.954	0.210	0	1
汽车拥有情况	4565	0.483	0.500	0	1
是否参加社会基本养老保险	4565	0.770	0.421	0	1
全年家庭总收入	4445	11.61	1.812	6.551	14.91

在所有样本中仅有 390 位受访者购买了商业养老保险,占受访者的比例约为 8.5%,可见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人不多。而购买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的受访者为 3514 人,占受访者的比例约为 77%左右,可见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参与人数较多,社会普及面较广。家庭子女数量的均值为 1.7,可见受各种因素影响,多子女家庭不多。受访者平均年龄在 48 岁左右,处于中年时期的受访者较多。在婚姻状况方面,91%左右的受访者均处于在婚或同居状态,说明家庭结构普遍完整。健康状况只有约 16%的受访者处于一般健康水平以下,59%左右的受访者认为养老主要由子女负责,整体经济状况较低于平均水平,96%左右受访者拥有房产,48%左右受访者拥有汽车。综上所述,所有变量描述均符合预期,具有实证可行性。

4.4 模型构建

4.4.1 OLS 回归模型

本文着重研究子女结构对商业养老保险参与的影响，采用问卷中受访者是否购买商业养老保险来代表居民的商业养老保险参与行为。本文在基准回归阶段将利用 OLS 回归模型得出结论。本文所构建的 OLS 回归模型如下所示：

$$y = \alpha + \beta structure + \gamma control + \varepsilon \quad (4.1)$$

其中， $\varepsilon \sim N(0, \sigma^2)$ 。

y 为被解释变量，代表商业养老保险的购买参与度； $structure$ 为解释变量，代表子女结构，包括子女数量和子女性别； $control$ 代表所有控制变量； α 为截距项， β 、 γ 为参数， ε 是随机扰动项。

4.4.2 倾向得分匹配模型

“是否独生子女”和“有无儿子”分别代表子女数量和子女性别，作为赋值为 0 或 1 的二元虚拟变量 D_i 和 S_i 。当赋值为 1 时，分别表明子女数大于 1 即子女数量多与子女当中有儿子。非独生子女、有儿子时实验组中的解释变量 $D_i=1$ ， $S_i=1$ ，其商业养老保险参与为 L_{i1} ，独生子女和只有女儿时实验组中的解释变量 $D_i=0$ ， $S_i=0$ ，其商业养老保险参与为 L_{i0} ，计算公式如下：

$$L_i = L_{i1} - L_{i0} = K_i + \alpha D_i + \xi \quad (4.2)$$

$$L_i = L_{i1} - L_{i0} = K_i + \beta S_i + \tau \quad (4.3)$$

公式中，(4.1) 和 (4.2) 中的 L_i 分别表示为研究子女数量和子女性别时第 i 个受访者的商业养老保险参与状况， K_i 为第 i 个受访者的控制变量， ξ 和 τ 分别是干扰项。接着通过以下计算公式对是否独生子女和有无儿子的受访者数据进行倾向匹配：

$$\ln\left(\frac{A_i}{1-A_i}\right) = \gamma + \delta Z + \varepsilon_i \quad (4.4)$$

$$\ln\left(\frac{B_i}{1-B_i}\right) = \vartheta + \iota V + \kappa_i \quad (4.5)$$

其中 $A_i = p(X_i = 1|K_i)$ 和 $B_i = p(Y_i = 1|K_i)$ 分别代表的是受访者子女数大于 1 和有儿子的条件概率。在计算出得分值 PS_i 后，再计算第 i 个受访者子女数大于 1、有儿子的平均处理效应 ATT，计算公式如下：

$$ATT = \frac{1}{N_1} [\sum l_i - \sum \omega(A_i, A_k) l_{k0}] \quad (4.6)$$

$$ATT = \frac{1}{N_2} [\sum l_i - \sum \omega(B_i, B_k) l_{k0}] \quad (4.7)$$

上述两个公式中， N_1 和 N_2 分别代表的是子女数量和子女性别的实验组样本量，匹配后的实验组下标为1，匹配后的对照组下标为0， l_{k0} 分别代表对照组第k个子女数为1和只有女儿的商业养老保险参与水平， $\omega(A_i, A_k)$ 和 $\omega(B_i, B_k)$ 为倾向匹配得分的权重函数，权重函数根据匹配方法确定。

4.4.3 中介效应模型

本文以子女数量和子女性别为自变量，以商业养老保险参与为因变量，全年家庭总收入为中介变量，运用中介效应检验，探究全年家庭总收入在子女结构对商业养老保险参与的影响之间是否具有中介作用。为了验证全年家庭总收入的中介作用，本文参考温忠麟等（2014）的中介效应检验流程，用图4.1和图4.2表示中介效应模型，其中图4.1的系数c代表总效应，图4.2的路径分析中， c' 代表直接效应，ab代表中介效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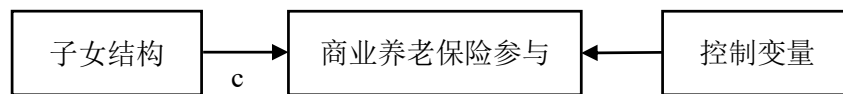


图 4.1 子女结构对商业养老保险参与影响的总效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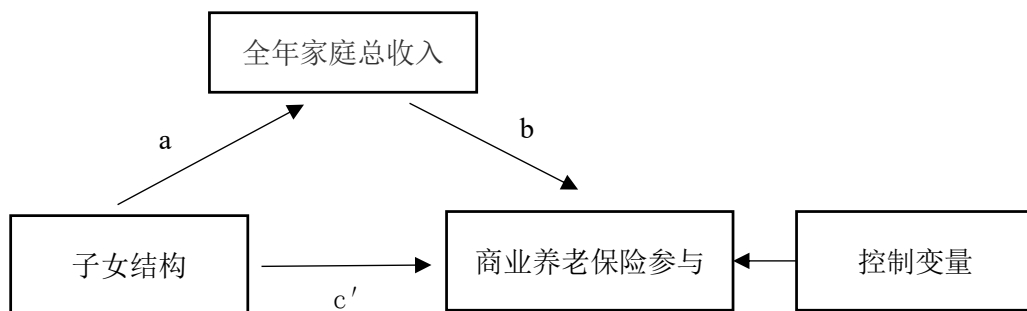


图 4.2 子女结构对商业养老保险参与影响的中介效应与直接效应

4.5 回归结果分析

4.5.1 基准回归分析

本文通过 OLS 回归分析，实证探讨了“子女数量”“子女性别”与商业养老保险参与的作用关系。如表 4.3 所示，该表格分别列出了将子女数量、子女性别作为不同解释变量放入 OLS 模型中的回归结果。以下是对回归结果的详细解读：

表 4.3 子女结构对商业养老保险参与的影响

变量	是否购买商业养老保险	是否购买商业养老保险
子女数量	-0.013*** (-2.60)	
子女性别		-0.025** (-2.43)
性别	0.000 (0.05)	0.001 (0.06)
年龄	0.017*** (5.70)	0.017*** (5.91)
年龄的平方	-0.000*** (-5.90)	-0.000*** (-6.12)
婚姻状况	-0.014 (-1.00)	-0.016 (-1.10)
健康状况	-0.023** (-2.37)	-0.025** (-2.54)
养老观念	-0.028*** (-3.20)	-0.029*** (-3.35)
经济状况	0.011* (1.76)	0.011* (1.87)
房产拥有情况	-0.024 (-1.15)	-0.023 (-1.10)
汽车拥有情况	0.049*** (5.67)	0.050*** (5.79)
是否参加社会基本养老保险	0.031*** (3.40)	0.031*** (3.43)
常数	-0.263*** (-3.72)	-0.278*** (-3.94)
观测值	4555	4565
R ²	0.028	0.028

注：括号内为 t 值。***、**、*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以下各表同。

子女数量对商业养老保险参与呈负相关，且在 1%的置信水平上具备显著性。这表明在子女数量增加的同时，家庭商业养老保险购买意愿降低。主要因为传统观念里子女被视为父母年老时的依靠。就经济方面而言，子女能够在经济上帮助和支持年老父母，使他们的养老和医疗需求得到满足。就心理角度而言，父母更愿意和子女在长期生活的家庭中互相陪伴，希望能够家庭养老，不愿脱离和子女的家庭联系以及亲朋好友的交流。这样不仅能满足父母的社会交往需求，也能让父母更有归属感和安全感。因此，父母在得到家庭养老的同时，对养老风险的担忧明显降低，对养老保险的购买意愿也相应降低。

若家庭中有男性子女，参与商业养老保险会受到负向影响，并且在 5%水平上显著。首先，传统的家庭观念和文化背景可能影响家庭成员对商业养老保险的态度。普遍认为儿子在成年后应当承担起照顾和赡养父母的责任，因此家庭可能更倾向于依赖儿子的经济支持，而非通过购买商业养老保险来规划养老问题。其次，经济因素也是影响家庭参与商业养老保险的重要原因。养育儿子可能需要家庭投入更多的经济资源，特别是在教育、婚嫁等方面。这些经济压力可能导致家庭在分配财务资源时，优先考虑儿子的需求，而非购买商业养老保险。此外，如果家庭的财务状况相对紧张，购买商业养老保险可能会被视为一种额外的经济负担。最后，一些家庭可能缺乏对商业养老保险的充分了解，或者对其作用和意义持怀疑态度。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儿子作为潜在的养老支持，家庭也可能因为缺乏信任或理解而选择不参与商业养老保险。

年龄对商业养老保险的购买行为产生正向影响，而年龄的平方则对商业养老保险的购买行为产生了负向影响，且两种影响都是显著的。这说明受访者的年龄与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之间存在着倒“U”型的关系。随着年龄的增长，家庭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可能性会先增加后减少。当中年受访者具备一定社会经验并积累了一定财富后，尤其是在子女独立之后，他们更加关注未来的养老问题，更倾向于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然而，在年龄增长到一定程度之后，由于商业养老保险参保年龄、保费增长和缴费期的限制，购买商业养老保险并不明智。因此，居民通常会选择其他替代品进行投资，以追求更高的性价比。

性别并不显著，说明性别并非是影响商业养老保险参与程度的主要因素。婚姻状况也不显著。可能原因在于已婚和同居的受访者相对于其他受访者来说，有更多的亲属和家庭成员需要照顾和负责，这增加了他们的家庭责任和经济负担，使得他们更加害怕面临风险，倾向于购买保险以获得保障。健康状况良好的受访者对商业养老保险的购买会产生积极影响，且该影响在 5%显著水平上得到确认。这主要是因为健康状况优越的个人存在逆向选择的倾向。商业养老保险的前提是投保人存活且达到一定年龄。因此，身体

健康的人更有信心领取更长时间的养老金，购买积极性更高。在养老观念方面，认为子女应承担养老保障责任的观念对商业养老保险参与产生了负面影响，并且具有明显的统计显著性。主要原因是受访者们认为，子女应该主要负责养老保障，而商业养老保险可以被子女所替代，符合传统养老观念的要求。但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状况的提升，家庭储蓄也相应增多，对养老风险并不十分担忧，对未来养老的生活品质要求较高，可供选择的养老产品更多，购买商业养老险的意愿下降。房产拥有情况对商业养老保险的购买行为影响并不显著，主要由于对房产要求的不高，没有限制数量和房产类型等，基本上所有人都拥有自住的房产。汽车拥有情况对商业养老保险的购买行为正向显著程度较高，因为家庭拥有汽车往往意味着家庭资产较多、收入较高、风险意识较强，因此家庭更能够在更广泛的范围内配置资金，因此更可能购买商业养老保险。

受访者参与社会养老保险提升了商业养老保险的参与度。这是因为持有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的居民通常更加关注未来的养老问题。由于基本养老保险的保障水平有限，一些居民可能会选择购买商业养老保险来获得更全面的保障。

4.5.2 稳健性检验

倾向得分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简称 PSM)是一类较为常用的统计方法，主要通过应用非实验数据或观测数据以达到干预效应分析的目的，常用于处理观察数据中存在的选择偏差问题，帮助研究者降低选择偏差，提高研究结果的可靠性。鉴于 OLS 回归可能存在选择性偏差导致内生性问题且只证明相关性，本文在研究子女结构对商业养老保险参与的影响时，剔除子女数量为 0 的家庭，分别从“有无儿子”和“是否独生子女”两个方面进行手动分组，采用倾向得分匹配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使研究结果更可靠，更准确的评估子女结构对商业养老保险参与的因果影响。

(1) 匹配有效性检验

倾向得分匹配估计首先要进行匹配的平衡性以及共同支撑检验，以保证匹配效果的可靠性。表 4.4 和表 4.5 分别代表子女数量和子女性别的匹配变量与平衡性检验结果。具体来看子女数量的匹配变量与平衡性检验结果，如表 4.4 结果显示，年龄、年龄的平方、婚姻状况、健康状况、养老观念、经济状况、汽车拥有情况和是否参加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在匹配前(Unmatched)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在匹配后(Matched)均不显著，而性别和房产拥有状况在匹配前后均是不显著的，也与表 4.3 的回归结果一致，证明他们对商业养老保险参与是没有影响的。同时匹配后所有变量的标准偏差(%bias)均小于

10%，说明进行匹配后，实验组和他们的匹配对象在这些因素之间是没有显著差别的，说明匹配结果很好，满足需要的平衡性假设。

表 4.4 子女数量：匹配变量与平衡性检验结果

Variable	Unmatched		Mean		%bias	%reduct bias	t-test	
	Matched	Treated	Treated	Control			t	p>t
性别	U	.41134	.4129		-0.3		-0.11	0.915
	M	.41169	.40666		1	-223.3	0.36	0.718
年龄	U	49.298	48.157		10.7		3.59	0.000
	M	49.256	48.938		3	72.2	1.04	0.297
年龄的平方	U	2545.4	2433		11.2		3.76	0.000
	M	2540.9	2510.2		3.1	72.7	1.07	0.284
婚姻状况	U	.92883	.8898		13.6		4.62	0.000
	M	.92863	.92713		0.5	96.2	0.20	0.838
健康状况	U	.1922	.11405		21.8		7.27	0.000
	M	.18992	.17477		4.2	80.6	1.38	0.167
养老观念	U	.64013	.51829		24.9		8.38	0.000
	M	.63911	.63877		0.1	99.7	0.02	0.980
经济状况	U	2.495	2.6304		-17.9		-6.03	0.000
	M	2.4976	2.4981		-0.1	99.6	-0.02	0.982
房产拥有情况	U	.95577	.9514		2.1		0.70	0.483
	M	.95605	.95437		0.8	61.6	0.29	0.775
汽车拥有情况	U	.44592	.52791		-16.5		-5.54	0.000
	M	.44677	.45282		-1.2	92.6	-0.43	0.669
是否参加 社会基本养老保险	U	.74387	.80077		-13.6		-4.56	0.000
	M	.74597	.74398		0.5	96.5	0.16	0.873

同样的观察子女性别的匹配变量与平衡性检验结果，如表 4.5 结果显示，通过 t 值分析发现，年龄、年龄的平方、健康状况、养老观念和房产拥有情况在匹配前均在 1% 的水平上显著，经济状况和是否参加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在 5% 的水平上显著，汽车拥有情况在 10% 的水平上显著，在匹配后均不显著，而在匹配前后均是不显著的，也与表 4.3 的基准回归结果一致，证明性别和婚姻状况对商业养老保险参与是没有影响的。同时匹配后所有变量的标准偏差均小于 10%，说明进行匹配后，实验组和他们的匹配对象在这些因素之间是没有显著差别的，说明匹配结果很好，满足需要的平衡性假设。

表 4.5 子女性别：匹配变量与平衡性检验结果

Variable	Unmatched	Mean		%bias	%reduct bias	t-test	
	Matched	Treated	Control			t	p>t
性别	U	.41069	.41622	-1.1		-0.33	0.744
	M	.41142	.41838	-1.4	-25.8	-0.59	0.558
年龄	U	49.161	47.606	14.4		4.23	0.000
	M	49.172	48.97	1.9	87	0.79	0.429
年龄的平方	U	2529	2387.5	14		4.09	0.000
	M	2529.4	2509.2	2	85.7	0.84	0.401
婚姻状况	U	.91258	.90642	2.1		0.63	0.529
	M	.91259	.91239	0.1	96.8	0.03	0.977
健康状况	U	.16759	.12299	12.7		3.57	0.000
	M	.16667	.14203	7	44.8	2.83	0.005
养老观念	U	.60122	.53387	13.6		3.98	0.000
	M	.60169	.58615	3.1	76.9	1.31	0.190
经济状况	U	2.5423	2.6007	-7.7		-2.24	0.025
	M	2.5437	2.5621	-2.4	68.5	-1.00	0.315
房产拥有情况	U	.95847	.93939	8.7		2.64	0.008
	M	.96008	.95763	1.1	87.1	0.51	0.609
汽车拥有情况	U	.47546	.50713	-6.3		-1.84	0.065
	M	.47582	.48187	-1.2	80.9	-0.50	0.616
是否参加 社会基本养老 保险	U	.76242	.79234	-7.2		-2.07	0.039
	M	.76311	.77838	-3.7	49	-1.50	0.132

观察倾向得分的共同取值范围，子女数量和子女性别倾向得分的共同取值范围在图 4.3 和图 4.4 中分别呈现，直观的可以看到他们实验组和控制组的图像是大致对称的，其中大部分观测值均落在共同取值范围内，只有个别样本未在此取值范围，满足共同支撑检验的要求。此外，匹配前样本的倾向得分偏低，但匹配后得分有所上升，说明在处理组和对照组之间的匹配处理，有效地降低了研究结果产生偏差的风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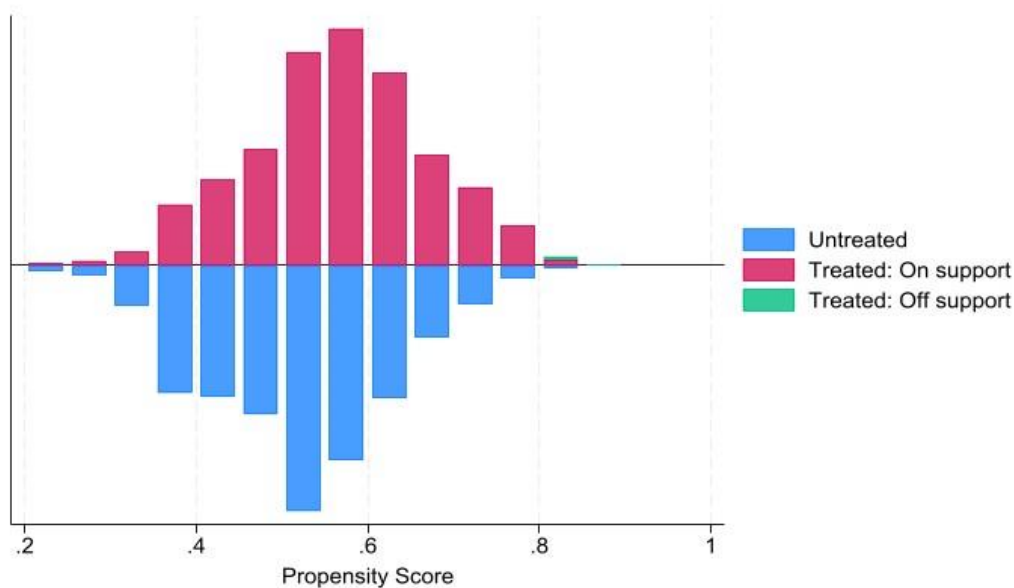


图 4.3 子女数量：倾向得分的共同取值范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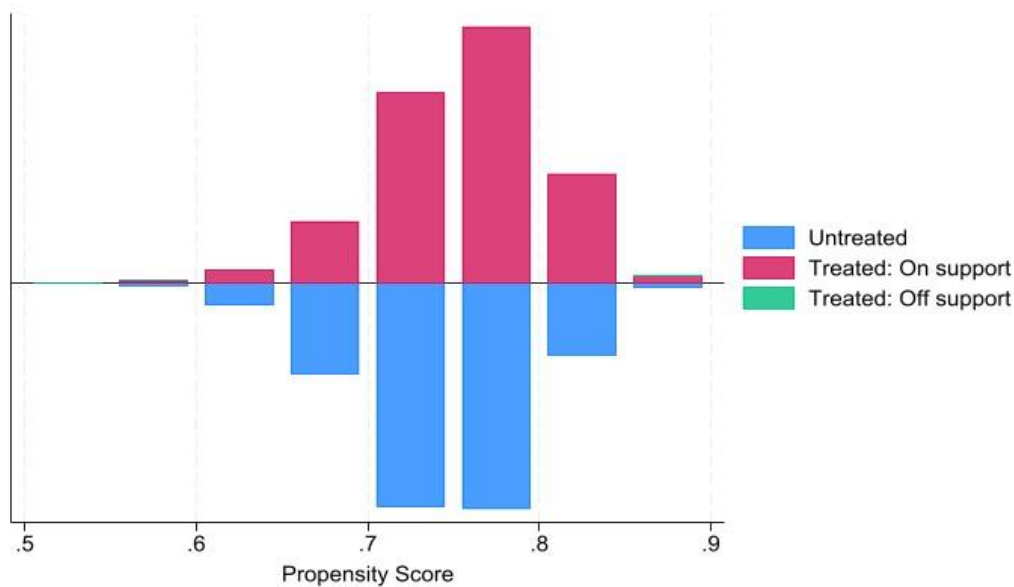


图 4.4 子女性别：倾向得分的共同取值范围

子女数量和子女性别的各变量标准偏差结果图分别在图 4.5 和图 4.6 中呈现，可以看出在匹配前标准偏差较大，匹配后标准偏差都显著减少且趋向于 0，且这些变量的分布较为集中，符合平衡性检验通过的条件。因此，基于以上检验结果，本文可以认为通过倾向得分匹配得出的结果是可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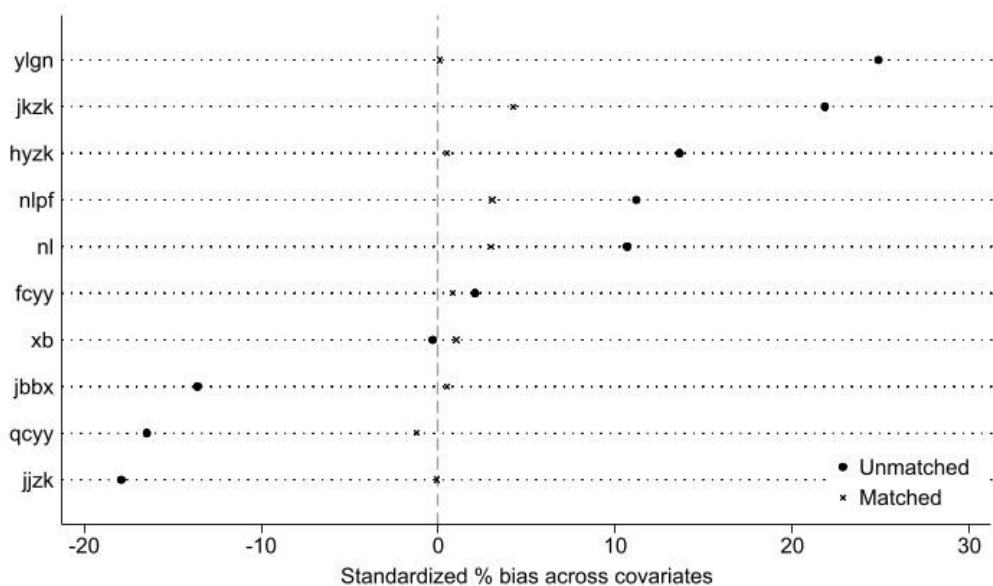


图 4.5 子女数量：各变量标准偏差结果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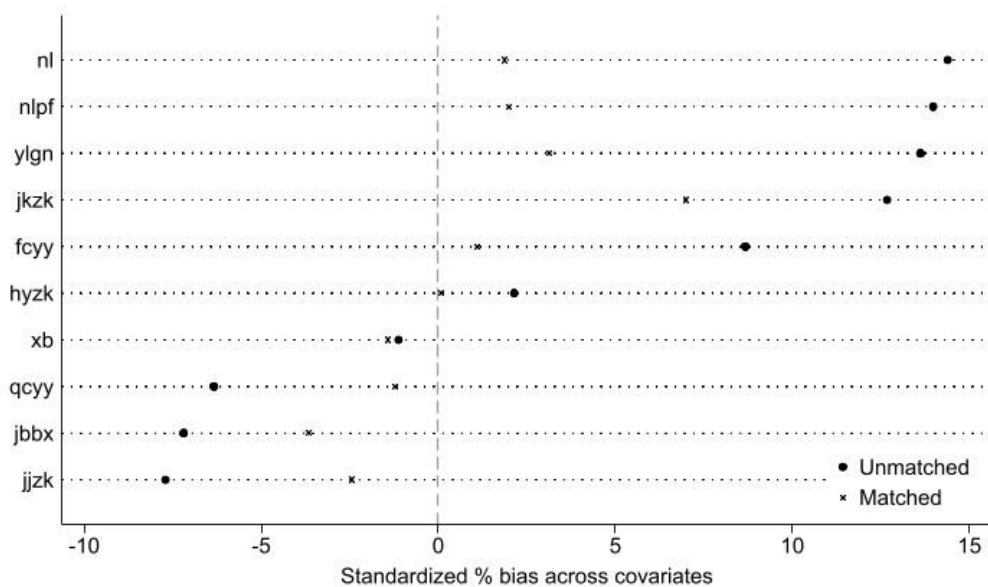


图 4.6 子女性别：各变量标准偏差结果图

(2) 倾向得分匹配估计结果

通过匹配有效性检验之后，本文通过随机抽样 500 次以避免数据顺序对匹配结果产生误差，采用默认 0.06 半径的核匹配法、1: 4 的近邻匹配法和 0.01 半径的半径匹配法三种匹配方法，实证分析子女结构与商业养老保险参与的关系。估计结果如表 4.6 和表 4.7 所示。

表 4.6 子女数量对商业养老保险参与的影响—PSM 估计结果

匹配方法	类别	实验组	对照组	差值/ATT 效应值	标准误	t 值
核匹配	匹配前	0.0655	0.1092	-0.0437***	0.0083	-5.27
	ATT 效应	0.0657	0.0942	-0.0284***	0.0089	-3.18
最近邻匹配 (1: 4)	匹配前	0.0655	0.1092	-0.0437***	0.0083	-5.27
	ATT 效应	0.0655	0.0948	-0.0293***	0.0102	-2.87
半径匹配 (0.01)	匹配前	0.0655	0.1092	-0.0437***	0.0083	-5.27
	ATT 效应	0.0657	0.0940	-0.0282***	0.0091	-3.09

如表 4.6 所示，子女数量对商业养老保险参与的影响，通过近邻匹配、半径匹配和核匹配的估计结果符号一致均为负，并且都在 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子女数量对商业养老保险参与是负向显著相关且相关性较强。根据 PSM 估计结果，子女数量与商业养老保险参与的相关性系数分别为-0.0284、-0.0293、-0.0282，说明与多子女家庭相比，独生子女家庭参与商业养老保险的概率低 2.82%—2.92%。三种方式均能证明子女数量的增加能够抑制商业养老保险参与，存在因果关系。

表 4.7 子女性别对商业养老保险参与的影响—PSM 估计结果

匹配方法	类别	实验组	对照组	差值/ATT 效应值	标准误	t 值
核匹配	匹配前	0.0775	0.1096	-0.0321***	0.0096	-3.34
	ATT 效应	0.0778	0.1029	-0.0251**	0.0106	-2.36
最近邻匹配 (1:4)	匹配前	0.0775	0.1096	-0.0321***	0.0096	-3.34
	ATT 效应	0.0775	0.0977	-0.0202*	0.0117	-1.72
半径匹配 (0.01)	匹配前	0.0775	0.1096	-0.0321***	0.0096	-3.34
	ATT 效应	0.0778	0.1015	-0.0237**	0.0108	-2.19

如表 4.7 所示，关于子女性别对商业养老保险参与的影响，核匹配和半径匹配的估计结果符号一致均为负，并且在 5%的水平上显著，最近邻匹配的估计结果符号也为负，且在 10%的水平上显著。根据 PSM 结果，相关性系数分别为-0.0251、-0.0237、-0.0202，说明与只有女儿的家庭相比，有儿子的家庭参与商业养老保险的概率低 2.02%—2.51%。三种匹配方法均能证明有儿子的家庭会显著抑制商业养老保险参与，这与前面的回归结果都是相吻合的。

4.5.3 异质性分析

(1) 区域异质性

在对子女数量、子女性别与商业养老保险参与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时，我们发现不同地区之间存在明显的异质性。这种差异主要是由于各地区在经济水平、公共服务、思想观念、家庭结构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明显差异所致。特别是在东、中、西部三个不同的地区，这些差异对家庭养老保险参与决策产生了显著影响。如图 4.7 所示，样本中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消费者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研究区域异质性有利于探究商业养老保险发展不平衡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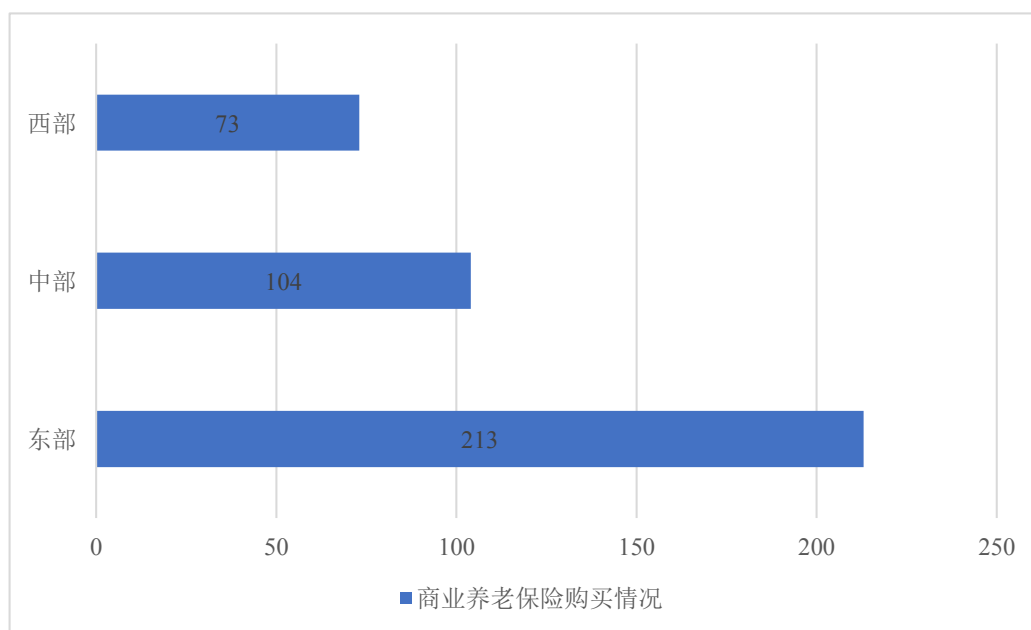


图 4.7 不同区域商业养老保险购买情况

表 4.8 列示了东中西部地区家庭之间的异质性分析结果。对于东部地区的家庭来说，由于该地经济相对发达、社会保险机制完善以及就业机会更多，家庭可能更倾向于依赖社会保险和自身积蓄来满足未来的养老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家庭有多个子女或不同性别的子女，商业养老保险可能不再被视为养老保障的主要补充。此外，东部地区的家庭可能更加开放和现代化，更倾向于股票投资等现期能看到收入的投资，对需达到约定年龄才能拿到保险金给付的商业养老保险认可和接受程度相对较低。中部和西部地区家庭在养老保险参与决策上可能受到更多因素的影响。尤其是那些子女数量较多的家庭，家庭的资源更多地用于子女教育等事项，从而导致家庭在养老保障方面的资金投入相对有限，对商业养老保险的需求和参与度较低。另外，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社会保险制度不够健全，因此家庭对未来养老保障的担忧可能较为突出。然而，这种担忧并未明显影响他们在商业养老保险方面的决策，或许是因为这些地区的家庭更依赖于传统的家庭养老

方式，或者是对商业养老保险的认识和了解程度较低。

表 4.8 子女结构对商业养老保险参与的影响（分区域）

变量	子女数量			子女性别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部	中部	西部
子女数量	-0.032*** (-3.48)	0.011 (1.03)	-0.007 (-1.12)			
子女性别				-0.030* (-1.76)	-0.020 (-1.07)	-0.003 (-0.16)
性别	-0.010 (-0.66)	0.017 (1.18)	-0.004 (-0.26)	-0.010 (-0.68)	0.016 (1.13)	-0.003 (-0.24)
年龄	0.022*** (3.71)	0.019*** (3.94)	0.007* (1.80)	0.022*** (3.81)	0.019*** (3.98)	0.008* (1.88)
年龄的平方	-0.000*** (-3.98)	-0.000*** (-3.90)	-0.000** (-2.02)	-0.000*** (-4.08)	-0.000*** (-3.88)	-0.000** (-2.10)
婚姻状况	-0.005 (-0.22)	-0.051* (-1.70)	0.008 (0.44)	-0.009 (-0.36)	-0.047 (-1.54)	0.007 (0.37)
健康状况	-0.037** (-1.99)	-0.022 (-1.42)	-0.005 (-0.34)	-0.040** (-2.09)	-0.022 (-1.39)	-0.006 (-0.40)
养老观念	-0.018 (-1.14)	-0.023 (-1.61)	-0.028* (-1.94)	-0.020 (-1.33)	-0.022 (-1.49)	-0.030** (-2.03)
经济状况	0.018* (1.68)	0.009 (0.82)	0.002 (0.25)	0.019* (1.75)	0.008 (0.74)	0.003 (0.36)
房产拥有情况	-0.052 (-1.46)	0.018 (0.54)	0.010 (0.44)	-0.052 (-1.45)	0.019 (0.56)	0.010 (0.44)
汽车拥有情况	0.042*** (2.64)	0.056*** (3.95)	0.039*** (2.71)	0.043*** (2.75)	0.056*** (3.95)	0.039*** (2.74)
是否参加社会基本养老保险	0.020 (1.10)	0.001 (0.09)	0.059*** (4.82)	0.022 (1.21)	-0.001 (-0.03)	0.060*** (4.91)
常数	-0.296** (-2.10)	-0.376*** (-3.07)	-0.133 (-1.33)	-0.333** (-2.37)	-0.352*** (-2.87)	-0.152 (-1.47)
观测值	1805	1471	1279	1808	1473	1284
R ²	0.032	0.029	0.030	0.029	0.028	0.029

（2）工作部门异质性

国有与非国有部门及企业在运营机制、人员配置、薪酬结构以及工资福利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不仅影响了企业的运营模式和员工待遇，也深刻影响了员工家庭的养老保障决策。为了更细致地探讨子女状况对商业养老保险参与的影响，本文将样本

按照受访者是否在国有部门及企业工作进行了分类，并进行了分样本验证。如图 4.6 所示，国有部门及企业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有 56 人，其余均为非国有部门及企业人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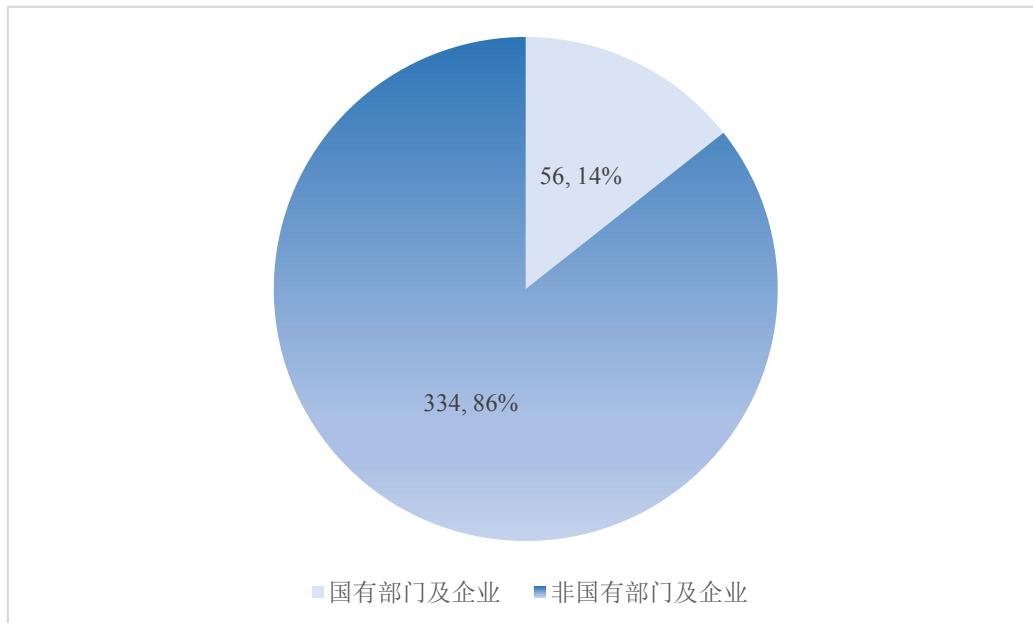


图 4.5 不同区域商业养老保险购买情况

通过表 4.9 的结果，我们可以观察到，在非国有部门及企业工作的家庭中，子女数量和子女性别对商业养老保险的参与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背后的原因主要在于非国有部门往往工作稳定性较差，福利保障相对薄弱，这使得家庭面临较大的生活不确定性和抗风险能力较弱的困境。因此，这些家庭更加依赖子女来保障未来的老年生活。随着子女数量的增加，家庭更倾向于将资源投入到子女的成长和教育上，而非购买商业养老保险。同时，非国有部门的工作门槛比国有部门低，从业人员学历水平等方面较低一些。他们更容易受到传统思想的禁锢，更看重儿子的养老保障作用，认为儿子在养老方面承担更大的责任，进一步降低了家庭购买商业养老险的意愿。

相比之下，在国有部门及企业工作的家庭，由于享有较高的福利待遇、保障水平和工作稳定性，他们能够通过工作收入、退休金等途径相对更好地保障晚年生活。因此，他们通过子女分散养老风险的需求相对较低，子女数量和子女性别对商业养老保险参与的影响也就不那么显著。此外，国企部门进入门槛较高，这些员工的文化水平和教育程度通常较高，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相对淡化，儿子和女儿在家庭中的地位更加平等，这也减少了因子女性别差异而影响商业养老保险参与的可能性。

表 4.9 子女结构对商业养老保险参与的影响（分工作部门）

变量	是否购买商业养老保险			
	国有	非国有	国有	非国有
子女数量	0.014 (0.35)	-0.013*** (-2.63)		
子女性别			0.001 (0.03)	-0.027** (-2.52)
性别	-0.022 (-0.51)	0.000 (0.05)	-0.023 (-0.51)	0.000 (0.05)
年龄	0.023 (1.36)	0.016*** (5.35)	0.022 (1.30)	0.016*** (5.58)
年龄的平方	-0.000 (-1.29)	-0.000*** (-5.51)	-0.000 (-1.22)	-0.000*** (-5.74)
婚姻状况	-0.190* (-1.77)	-0.006 (-0.44)	-0.189* (-1.78)	-0.008 (-0.54)
健康状况	0.050 (0.48)	-0.023** (-2.44)	0.050 (0.47)	-0.025*** (-2.62)
养老观念	-0.018 (-0.45)	-0.026*** (-2.99)	-0.017 (-0.42)	-0.027*** (-3.12)
经济状况	-0.011 (-0.33)	0.010* (1.66)	-0.010 (-0.30)	0.010* (1.74)
房产拥有情况	-0.012 (-0.11)	-0.024 (-1.16)	-0.018 (-0.16)	-0.023 (-1.11)
汽车拥有情况	0.112** (2.46)	0.044*** (5.03)	0.110** (2.43)	0.045*** (5.15)
是否参加社会基本养老保险	0.042 (0.67)	0.028*** (3.08)	0.039 (0.61)	0.029*** (3.11)
常数	-0.248 (-0.56)	-0.246*** (-3.54)	-0.198 (-0.47)	-0.261*** (-3.75)
观测值	338	4217	339	4226
R ²	0.034	0.026	0.033	0.026

4.5.4 中介效应分析

如表 4.10 的回归结果可知：自变量子女数量对商业养老保险参与情况的影响系数在 5%的水平上显著，即总效应 c 显著；其次，子女数量对全年家庭总收入的影响系数也在 1%的水平上显著，即系数 a 显著；再次，在加入中介变量后，全年家庭总收入对商业养老保险参与的影响在 10%的水平上显著，即系数 b 显著。由于系数 a 与 b 均显著，那么间接效应显著，即全年家庭总收入在子女数量与商业养老保险参与情况间起到了中介效应。然后检验方程中系数 c' 的显著性，加入全年家庭总收入这一中介变量

后，子女数量对商业养老保险参与的影响系数在 5%的水平上显著，即 c' 显著，表明直接效应显著，比较 c' 和 ab 的符号，两者同号，即为部分中介效应。

表 4.10 中介效应：自变量为子女数量

	是否购买商业养老保险	全年家庭总收入	是否购买商业养老保险
子女数量	-0.0126** (-2.4702)	-0.1287*** (-3.9326)	-0.0108** (-2.0768)
全年家庭总收入			0.0040* (1.6850)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	4555	4436	4436
Sobel (P 值)		无须 Sobel 检验	
中介效应		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如图 4.8，子女数量对全年家庭总收入的影响系数 a 符号显著为负，说明子女数量的增加会使全年家庭总收入减少。子女数量影响全年家庭总收入主要可以从影响父母双方的劳动供给进行分析。从母亲的劳动供给角度出发，母亲在生育后会大幅度增加对家庭投入的精力和时间，因而子女数量的增加对母亲劳动供给具有显著的负效应。从父亲的劳动供给角度出发，一方面，由于家庭规模的扩大，需要抚养的人口增加，能激励父亲去从事报酬更为丰厚的职业并更加努力地工作，以获得较高的收入缓解家庭的生存压力，另一方面，随着子女数量的增加，母亲已无力独立抚养更多的子女，必然会要求父亲付出一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应付繁杂的家庭事务，因而不仅会减少父亲的劳动供给，而且会影响父亲的工作效率。因此，子女数量越多，使得父母可供劳动的时间越少，并最终体现为全年家庭总收入的减少。全年家庭总收入对商业养老保险参与情况的影响系数 b 显著，符号为正，说明全年家庭总收入的增加会促进居民对商业养老保险的购买。中介效应的传导机制可以总结为子女数量增加使全年家庭总收入减少，全年家庭总收入减少降低了商业养老保险的参与可能性，中介效应的影响方向与直接效应的影响方向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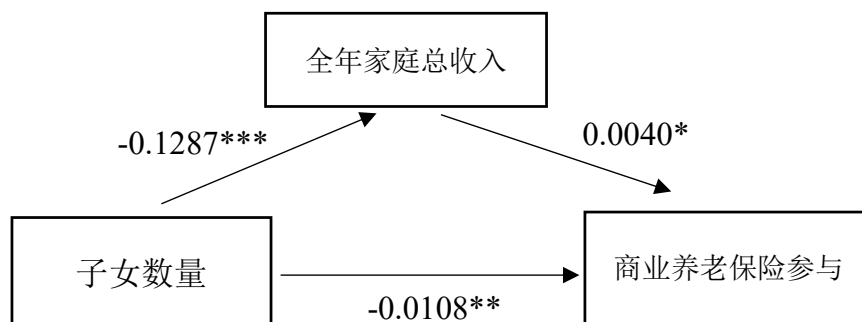


图 4.8 子女数量对商业养老保险参与影响的路径分析

如表 4.11 的回归结果可知：自变量子女性别对商业养老保险参与情况的影响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即总效应 c 显著；其次，子女性别对全年家庭总收入的影响系数不显著，即系数 a 不显著；再次，全年家庭总收入对商业养老保险参与的影响显著，即系数 b 显著。由于系数 a 和 b 有一个不显著，那么需要用 Sobel 方法检验 ab。中介效应的 Sobel 检验 P 值大于 0.05，因此不存在中介效应。通过已有文献的研究结论，家有男孩可以显著地增加父亲的劳动收入，但对母亲劳动收入的增加效应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中“男人以事业为重，女人以家庭为重”起着调节效应。子女性别对全年家庭总收入的影响在农村地区更为明显，重男轻女观念越强烈，越追求男性子女的出生，占据母亲劳动时间越多，母亲劳动收入越低。除此以外，本文研究数据中，剔除缺失值，家庭年总收入大于等于 300 万元的家庭共 773 户，年收入越高的家庭文化程度越高，男女平等观念越深入，相较于低收入家庭高收入家庭对男性子女的偏好会更低。因此，在本研究中，家庭中拥有男性子女，即子女性别中对男性子女的偏好通过影响全年家庭总收入进而影响商业养老保险参与的路径不成立，不存在中介效应。

表 4.11 中介效应：自变量为子女性别

	是否购买商业养老保险	全年家庭总收入	是否购买商业养老保险
子女性别	-0.0250*** (-2.6208)	-0.0270 (-0.4423)	-0.0210** (-2.1678)
全年家庭总收入			0.0042* (1.7624)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	4565	4445	4445
Sobel (P 值)		0.668	
中介效应		不存在中介效应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5.1.1 基于全样本分析得出的结论

受传统养儿防老观念的影响,拥有更多子女的家庭往往更加倾向于依赖家庭内部资源来分担养老风险。多数父母认为子女的存在就是一种“保障”,子女越多保障越多,而且分散到每个子女的赡养压力会更小。而且前期对子女抚养成本的付出就是投资,年老时子女提供的养老保障就是回报。除此以外,从经济的角度来看,由于家庭的可持续收入是有限的,养育子女往往需要家庭投入大量资金。这意味着,为了保障子女的成长与教育开支,其他层面的支出必须进行调整,进而用于商业养老保险的支出金额受到限制,参与意愿下降。

子女性别不同也显著影响着商业养老保险的参与。对比只有女儿的家庭,子女中有儿子的家庭在参与商业养老保险方面表现出较低的意愿。这主要是因为许多家庭认为儿子应承担主要的赡养责任,从而减少对商业养老保险的依赖。同时,养育儿子通常意味着更高的经济投入,特别是在儿子的结婚阶段,这进一步影响了家庭在商业养老保险方面的支出。

5.1.2 基于区域异质性分析得出的结论

东、中、西部中只有东部地区与主回归结果一致,呈现出负向显著,即子女结构降低了商业养老保险的参与。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东部地区拥有更高的城市化程度和更发达的经济,可替代养老保险的金融产品多种多样,因此会选择其他养老风险保障方式,降低对商业养老保险的参与。另一方面是因为东部地区拥有较深的老龄化程度,要承担子女抚养和赡养老人的双重负担,抚养和赡养支出占据了家庭的大部分经济收入,所以对自身商业养老保险的参与会减少。

5.1.3 基于工作部门异质性分析得出的结论

对工作部门进行区分后,明确子女数量和子女性别在非国有部门及企业工作的家庭中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相反对于国有部门及企业工作的家庭影响不显著。通过研究的

展开，根本原因是因为国有部门在工作稳定性方面更强，在福利待遇方面更有保障，在应对养老风险时，企业年金可以有效增加其退休后收入，所以该类家庭有更强的抗风险性，因此不太需要商业养老保险来分散养老风险。

5.2 建议

商业养老保险作为三大支柱养老保险体系的第三支柱，肩负着缓解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的压力，弥补企业年金不足的使命。然而，尽管我国政府和保险公司已经对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给予了高度关注，但当前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方面，商业养老保险的参与度相对较低，许多人对其重要性和优势认识不足，导致保险市场的潜在需求未能得到充分释放。另一方面，市场上的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缺乏创新和针对性，未能充分满足不同群体的个性化需求，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购买意愿。为了推动我国商业养老保险的健康发展，本文基于实证分析的结论，提出以下建议。

5.2.1 创新保险产品满足多方位需求

保险公司在设计商业养老保险产品时，应充分考虑家庭抚养负担的多样性。不同家庭因子女数量和性别不同，保险需求存在显著差异。因此，保险公司应针对不同家庭类型，开发具有针对性的保险产品。举例来说，保险公司可以深入细分保险产品，结合参保人的家庭总收入和抚养、赡养负担。保险公司应当将客户调研情况与实际相结合，为满足不同子女数量和性别的家庭的多样化需求，针对各类家庭设计适配性较强的养老保险产品。根据不同分类，保险公司可以适当调整保障方式和保险费率等。比如：对于高收入独生子女家庭，可以适度增加养老金金额、提供全面的医疗保障以及长期护理服务等，以满足投保人在养老过程中的全方位需求。对于多子女家庭，在养老规划上可能更加注重家庭成员间的风险共担和资源共享。保险公司可以推出多子女家庭共享保障计划，不仅能够涵盖父母的养老保障，还可以将子女纳入保障范围，提供包括意外伤害、疾病医疗等在内的全面保障。通过家庭共享的方式，实现保险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家庭成员间的风险共担。对于低收入家庭，保险公司可以更侧重于缴费方式的创新，有效降低购买养老保险的经济负担。

除了基本的养老保障外，保险公司还可以根据家庭需求提供增值服务，以增强家庭对保险产品的依赖和满意度。例如，针对有老年慢性病的家庭，可以提供慢性病管理保

障，包括定期药品供应、健康咨询等。对于注重生活品质的家庭，可以提供旅游保险、高端医疗服务等增值服务。同时，可以考虑投保人子女所处的成长阶段，为子女提供教育规划、职业培训等咨询服务。同时，保险公司也可以提供养老方面的服务。例如，为投保人提供定期体检、健康讲座等。这不仅可以提升自己的行业竞争力，也可以增强客户粘性，提升客户忠诚度，以便于进行其他保险产品的推销。此外，保险公司还可以与第三方机构合作，为家庭提供更加全面和专业的服务。例如，与医疗机构合作，提供优先就医、绿色通道等医疗服务；与教育机构合作，提供优质的教育资源和培训机会；与金融机构合作，提供个性化的理财方案和投资建议等。

5.2.2 推动缴费金额弹性化顺应负担差异

经济状况一般的家庭，在承担抚养子女和赡养老人的责任时，会面临巨大的经济压力。这时，家庭的经济资源会被优先用于满足基本需求，从而没有足够资金购买商业养老保险。随着年龄的增长，收入也相应发生较大幅度的增长，经济状况有所好转。但年龄增长会使商业养老保险的保费和缴费年限问题成为新的问题。年龄越大，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保费越多，缴费年限越短。那么这时高昂的保费和缩短的缴费年限可能会再次让潜在客户望而却步。

针对这一问题，保险公司在设计养老保险产品时，不同家庭双重负担的差异性必须被纳入考虑范围。通过对缴费金额进行分阶段调整，为参保人提供更多选择的空间，满足其需要。在子女受教育阶段，家庭面临着较重的抚养压力，经济资源相对紧张。考虑到这一实际情况，保险公司可以通过降低保费的方式，减轻参保人家庭的经济负担，使其能够更好地平衡子女教育与养老规划之间的关系。随着子女的成长和家庭经济状况的改善，保险公司可以逐步调整缴费金额。这种渐进式的保费增长方式，既能够确保保险公司获得合理的收入，又能够让家庭在负担能力范围内逐渐增加对商业养老保险的投入。这种人性化的保费设置方式，不仅能提升客户满意度，还能使保险产品更加贴近家庭的实际需求，提高保险市场的整体效率和竞争力。通过这些措施，保险公司可以在满足家庭养老保障需求的同时，推动商业养老保险市场的健康发展。

5.2.3 利用科技赋能提升服务效率与体验

首先，保险公司应充分利用保险科技设计和推广个性化养老保险。通过大数据分析

和人工智能技术，保险公司能够更准确地了解不同家庭的需求和子女抚养负担情况，从而进行区别化、针对性的险种设计，使得商业养老保险更加贴近家庭的实际需求，提高了产品的吸引力和市场竞争力。其次，保险公司可以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提升养老保险的风险管理和监测能力，引入先进的算法和模型，以便更加准确地评估客户的养老风险，并制定相应的风险管理策略。同时，利用物联网和传感器技术，保险公司可以实时监测客户的健康状况和生活状态，及时发现潜在的风险和问题，为客户提供更加及时和有效的保障。最后，保险公司可以通过互联网保险渠道改善养老保险的客户服务体验。通过智能客服系统、在线客服等渠道，客户可以随时随地与保险公司进行沟通和交流，解决疑问和问题。同时，利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保险公司还可以为客户提供更加生动、直观的保险知识普及和养老规划指导，提升客户对商业养老保险的认知和理解。

5.2.4 实施政策差异化

当前，国家高度重视结婚率、出生率等指标，为了促进人口增长和高质量发展，也推出了一系列的生育政策和养老政策。政府应该关注到子女结构的不同会对家庭抚养负担产生差异，从而影响商业养老保险的参与，影响整个社会养老问题的解决。

首先政府应充分考虑不同子女结构的差异性，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提供适当的补贴。子女数量对抚养支出的影响较为明显，子女越多，开销越大。子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但这也是建立在父母们牺牲自我养老的开支上。子女数量越多，父母就越需要不断提升自我薪资水平，提高家庭总收入以满足教育、医疗所需。而收入越高，个人所得税等方面也要相应增加，从而降低了个人可支配收入水平。因此，政府可以对响应国家政策生三胎、四胎的家庭经济提供者采用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的方式给予鼓励，也可以通过制定税收优惠政策，比如减免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税收，或者提供直接补贴，来降低公众的购买成本，从而激发大众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积极性。其次，加强养老保险政策的宣传和普及同样重要。养老保险一般保费较高，缴费期限较长，这就导致消费者的安全感不足，对能否如期收到保险年金持怀疑态度。尽管我国保险法对此有所规定，规定保险公司必须提取责任准备金，即使投保客户所购买年金的保险公司停业或破产，其余保险公司也会自动为购买者分担年金给付，确保了年金购买者的权益。但很多消费者如果没有主动了解这些内容，没有渠道认可商业养老保险。因此，政府应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向公众普及养老保险知识，提高公众的养老保险意识。这有助于增加商业养老保险的参保率，提高商业养老保险的覆盖面，从而更好地保障老年人生活。

参考文献

- [1] ALBOUY F X, BLAGOUTINE D. Insurance and transition economics: the insurance market in Russia[J]. *The Geneva Papers on Risk and Insurance. Issues and Practice*, 2001, 26(3): 467-479.
- [2] Beck T, Webb J. Economic, demographic Population growth, the dependency rate, and the pac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stitutional determinants of life insurance consumption across countries[J].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2002, 17(1): 51-88.
- [3] Berekson L.L. Birth Order, Anxiety, Affiliation and the Purchase of Life Insurance [J]. *Journal of Risk & Insurance*, 1972, 39(1).
- [4] Calvet L E, Campbell J Y, Sodini P. Measuring the financial sophistication of household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9, 99(2): 393-398.
- [5] Céline D ,Nick D .The causal effect of the number of children on gender-specific labour supply elasticities to the firm[J]. *Industrial Relations Journal*, 2021, 52(1): 2-24.
- [6] Ferber, Robert, Lucy Chao Lee. Acquisition and accumulation of life insurance in early married life[J]. *Journal of Risk and Insurance*, 1980, 47: 713-729.
- [7] Goldin C, Katz L F. Transitions: Career and Family Life Cycles of the Educational Elite[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8, 98(2): 363-369.
- [8] Hammond J D, David B H, and Eugene R M. Determinants of Household Life Insurance Premium Expenditures: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J]. *Journal of Risk and Insurance*, 1967, 34(3): 397-408.
- [9] Korenman S, Neumark D. Marriage, Motherhood, and Wages[J].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1992: 233-255.
- [10] Lewis F D. Dependents and the Demand for Life Insurance[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9, 79(3): 452-467.
- [11] Mark, J, Browne, et al. An International Analysis of Life Insurance Demand[J]. *The Journal of Risk and Insurance*, 1993, 60(4): 616-634.
- [12] Rosenbaum, Paul R.; Rubin, et al. The Central Role of the Propensity Score in Observational Studies for Causal Effects. *Biometrika*, 1983, 70 (1): 41-55.

- [13] Sara T. Aneconomic framework for persisting son preference:rethinking the role of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J]. 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2020(39):983-1007.
- [14] Sheng Z ,Rao F ,Yike L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Consumption Behavior of Commercial Personal Insurance in One-Child Families[J].Information Systems and Economics,2023,4(6):1-8.
- [15] Showers V E ,Shotick J A , The effects of household characteristics on demand for insurance:A tobit analysis[J]. Journal of Risk and Insurance,1994,61:492-502.
- [16] 邓婷鹤, 郑晓冬, 毕洁颖等. 家庭结构变迁视角下农村老年贫困研究[J]. 统计与信息论坛, 2022, 37(06):115-128.
- [17] 段志民. 子女数量对家庭收入的影响[J]. 统计研究, 2016, 33(10):83-92.
- [18] 樊纲治, 王宏扬. 家庭人口结构与家庭商业人身保险需求——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J]. 金融研究, 2015(07):170-189.
- [19] 范成杰. 代际关系的下位运行及其对农村家庭养老影响[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1):90-95.
- [20] 方丽, 田传浩. 筑好巢才能引好凤:农村住房投资与婚姻缔结[J]. 经济学(季刊), 2016, 15(2):571-596.
- [21] 傅一铮, 苏桂芳. 中国城乡家庭购买商业保险的影响因素分析[J]. 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5):17-28.
- [22] 高立飞, 王国军. 人口流动对居民商业保险需求的影响研究——基于CGSS2017数据的实证分析[J].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 2021, 42(02):85-91.
- [23] 郭钊杉. 商业养老保险凸显年轻化消费趋势[N]. 中华工商时报, 2021-07-28(004).
- [24] 郝静, 王伟. 子代支持对养老担心问题的影响——基于 2015 年第一代独生子女家庭调查[J]. 调研世界, 2017(07):13-16+21.
- [25] 衡元元. 子女数量、养老担忧与养老方式偏好探索[J]. 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18, 30(4):21-27.
- [26] 蹇滨徽, 杨亮, 林义. 多层次养老保险制度下家庭商业养老保险需求与养老金替代率研究[J]. 中国软科学, 2021(05):38-48.
- [27] 金融监管总局人身险司. 奋力推动商业养老保险高质量发展[N]. 中国银行保险报, 2024-01-17(001).

- [28] 李好好, 邓晓辉, 李立伟. 社会养老保险改革对商业寿险业的影响[J]. 上海金融, 2003(09):25-26+24.
- [29] 李璐桐, 毛磊. 助推行为对提高保险需求的异质性影响[J]. 保险研究, 2022(10):61-73.
- [30] 李威. 高投资背后的人口结构因素——基于省际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研究 [J]. 人口与经济, 2014, (01):47-54.
- [31] 李志南. 保险数字化改革的探索与实践[J]. 今日财富, 2023, (08):20-22.
- [32] 林温雅, 刘冠宏, 齐春宇. 家有男孩激励亲代挣得了更高的收入吗? [J]. 山西财政税务专科学校学报, 2022, 24(01):56-60+70.
- [33] 刘一伟. 社会养老保险、养老期望与生育意愿[J]. 人口与发展, 2017, 23(04):30-40.
- [34] 卢亚娟, 张雯涵. 家庭结构对家庭参与保险市场的影响研究[J]. 现代经济探讨, 2020(05):25-35.
- [35] 陆晶, 李取洋, 王酩翔. 金融科技视角下商业养老保险发展探究[J]. 现代商贸工业, 2022, 43(15):148-150.
- [36] 吕学梁, 马玉洁. 子女性别、住房数量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J]. 科学决策, 2021, (07):43-64.
- [37] 欧霞. 第三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发展的的问题与对策研究——以广东省为例[J]. 经济师, 2023, (12):30-32+35.
- [38] 潘东阳, 刘晓昀. 社会交往对农村居民健康的影响及其性别差异——基于PSM模型的计量分析[J]. 农业技术经济, 2020, (11):71-82.
- [39] 彭魏倬加. 信息渠道如何影响商业养老保险决策——来自CGSS的微观证据[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26(06):119-129.
- [40] 石贝贝, 唐代盛, 候藹. 中国人口生育意愿与男孩偏好研究[J]. 人口学刊, 2017, 39(02):28-36.
- [41] 苏洁. 保险目标用户趋向年轻化[N]. 中国银行保险报, 2021-07-07(005).
- [42] 汪伟, 刘玉飞, 彭冬冬. 人口老龄化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 2015(11):47-61.
- [43] 王军, 詹韵秋. 子女数量与家庭消费行为: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J]. 财贸研究, 2021, 32(01):1-13.

- [44] 王礼鹏. 调查报告:公众对个人养老金制度的认知与期待[J]. 国家治理, 2023, (06): 69-73.
- [45] 王韧, 许豪, 张双双. 子女结构会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吗——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证据[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22, 44(03):58-71.
- [46] 王鑫鑫, 朱青青. 家庭养育负担、养老保险参保意愿与行为:基于流动人口“三明治阶层”的分析[J]. 保险研究, 2021(8):83-96.
- [47] 王亚柯, 刘雪颖. 养老保险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研究——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的反事实估计[J]. 贵州社会科学, 2021(06):139-147.
- [48] 王一佳. 从效率角度看发展私人养老保险市场的重要意义[J]. 清华金融评论, 2017(S1):96-101.
- [49] 王翌秋, 王昊宇. 城乡家庭子女数量与家庭资产组合选择行为研究[J]. 金融与经济, 2018, (03):26-32.
- [50] 王争亚, 吕学静. 福利多元主义视角下我国养老服务供给主体问题解析[J]. 中国劳动, 2015(2X):6.
- [51] 夏国祥, 黄荣洁. 女性受教育程度、子女数量与家庭收入关系研究[J]. 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34(02):104-111.
- [52] 谢波峰, 常嘉路. 个税改革如何影响了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的需求[J]. 财贸经济, 2021, 42(07):49-66.
- [53] 徐强, 张开云, 周杨. 传统保障、养老保险与农村居民的养老担忧度[J]. 浙江社会科学, 2023(8):80-89.
- [54] 尹秀芳. 子女数量对农村家庭风险抵御能力的影响分析[J]. 农村经济, 2014(08):95-99.
- [55] 尹志超, 张紫璇, 严雨. 抚育子女对家庭保险需求的影响[J]. 金融论坛, 2022, 27(04):60-69.
- [56] 于长永. 他们在担心什么?——脆弱性视角下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风险与养老期望探究[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32(1):22-31.
- [57] 袁园. 专属商业养老保险发展提速拟从试点转向常态化[N]. 每日经济新闻, 2023-05-30(002).
- [58] 张川川. 子女数量对已婚女性劳动供给和工资的影响[J]. 人口与经济, 2011(5):29-35.

- [59] 张浩, 李文彬, 周利等. 多子女与家庭商业保险: 利他抑或投资?[J].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23, (01):26-38.
- [60] 张杰. 保险业参与养老产业的政策与建议[J]. 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47(02):98-104.
- [61] 张雷, 顾天竹. 子女增加会减少父母对商业保险的需求吗?——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实证分析[J]. 南方金融, 2020(5):63-72.
- [62] 张世龙, 陈杨洋. 子女数量对农村妇女非农就业的影响——基于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的分析[J]. 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2(04):114-124.
- [63] 张鑫, 孙立娟. 个税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购买意愿影响研究——来自中国职工养老储备指数调查数据[J].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20(2):52-61.
- [64] 赵锋, 张增敏, 陈增贤. 育儿对已婚女性就业的影响——基于代际分担的调节效用[J]. 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22(1):26-33.
- [65] 赵静. 有效提升我国养老服务供需融合水平研究[J]. 全球化, 2023, (05):83-95+134.

后 记

三月阳春，六月盛夏。正值青春年华，幸有财大相伴，幸遇恩师指点。行文至此，敲下“后记”二字时，意味着我三年研究生生涯即将画上句点，更意味着我的校园生活已然将结束。二十余年的求学，让我从一个小县城来的孩子转变为大城市求职的研究生，我万分感恩遇到的一切，求学时期遇到的每一位恩师，教会了我如何做人、如何做事。他们带给我的不仅仅是知识上的充盈，更是人生路上的启迪。踏踏实实做人，脚踏实地做事。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首先我要衷心的感谢我的恩师：高树棠老师。三年接触下来，师父对我产生的影响不仅仅是在学术上要实事求是，同时在为人处事方面也要谦虚谨慎，保持乐观向上的心态。师父不仅仅在论文写作上耐心的给予指导和解答，在生活和实习上也给予我极大的帮助，师父的照顾让我在这个陌生的城市倍感亲切，这一切我将铭记于心，祝愿师父一切顺利、身体健康。我将带着这份感恩之心走向社会，回报社会。

“树高千尺不忘根深沃土”。感谢我的爸爸妈妈和一直惦记着我的亲人。感谢你们对我不求回报的付出，尊重着我的每一个决定，每次尝试无论成败都会耐心开导我，让我内心充满着力量与底气，因为我知道无论何时何地背后永远有你们在支持着我。花开树依，花落树蔽。我会不断努力成长，成为独当一面的“小大人”！二十余年的养育之恩，不是一朝一夕，愿你们永远平安健康，未来我将努力成为你们的依靠。

“山水一程，三生有幸”。感谢大师兄对我论文的耐心指导，感谢师姐在工作上给予我的种种建议。感谢研究生遇到的特别的人，三年的陪伴让我倍感珍惜，未来希望我们能继续携手向前，每个人都朝着自己内心的方向前进。

最后，感谢不算聪明但始终保持着乐观的自己。“纵有几疾风起，人生不言弃。”相信事与愿违必是另有安排，努力成长为自己向往的模样，好好生活。